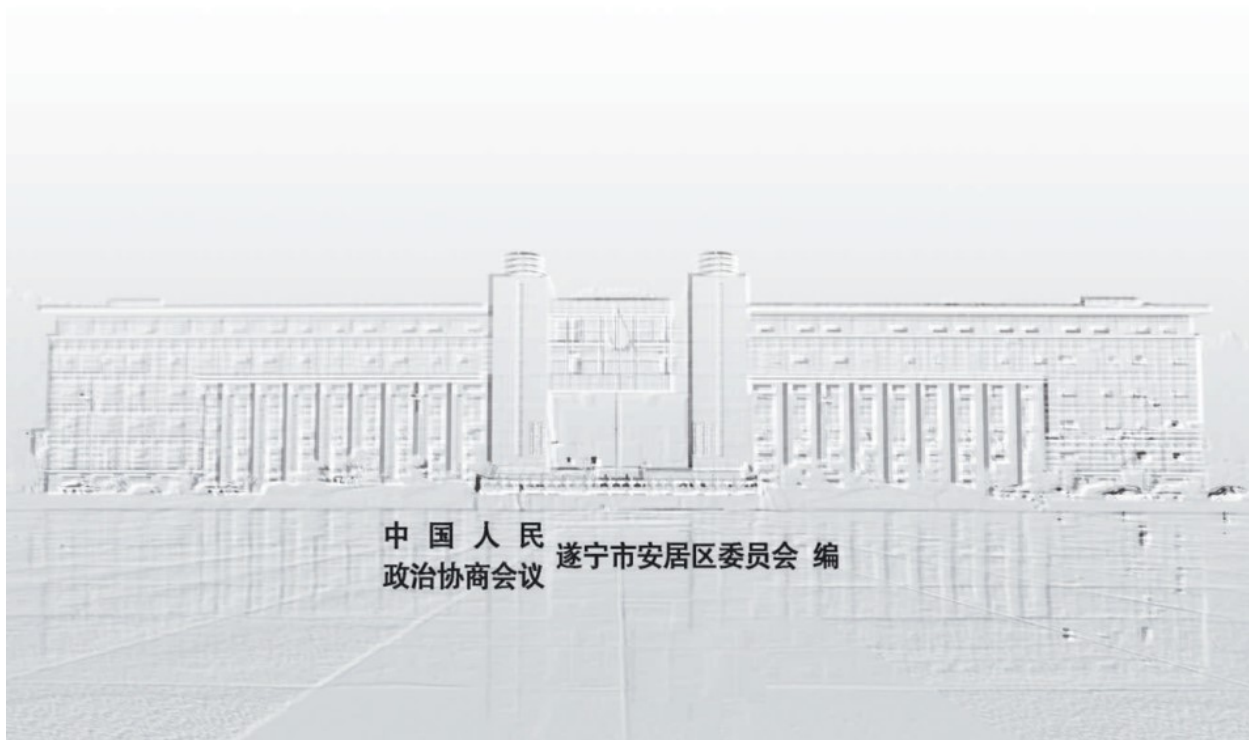


安居文史资料

AN JU WEN SHI ZI LIAO

<第八辑>



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 遂宁市安居区委员会 编

建国前

历史上对安居有杰出贡献的曾春潭先生

曾春潭，1888年生于遂宁安居老鹰嘴一个富裕家庭，1939年迁至同盟乡观音铺。清宣统二年，曾春潭毕业于四川省立潼川府高等学校，毕业回乡后目睹政府之腐败，经济文化之落后，民众之贫穷。他深知要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首先要从教育抓起。他多次拒绝了官府的聘请，拒不做官，立志造福乡梓，潜心从事教育培育人才。回乡后他任安居安溪书院院长，后改为县立高第二高等小学堂，他首任校长，多年兼授英语、地理、历史等学科。原成都《民生日报》总编彭其年、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刘皋、前遂宁省立师范学校著名语文老师廖应韩、李乃实都是他的学生。

民国十年（1921）政府大力推动新文化运动，提倡大办教育。曾春潭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改变家乡教育的落后状况，为家乡的经济培养人才。在他的倡议下，将曾氏祠堂百亩良田的收入作为经费，通过他的努力，说服了众多的族人，得到了整个曾氏族人的支持，创建安居镇曾氏私立小学校，曾春潭任董事长。为了保证师资质量，他高薪聘请了遂宁省立师范学校毕业生曾肇伦、曾文校先后任校长。

在任曾氏私立小学董事长期间，他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不辞辛劳，处处以身作则，带头尊重老师，尊重知识，关心师生学习和生活，对学生循循善导，传导知识，诲人不倦。他渊博的知识和高尚的品德以及对教育事业的无私的奉献，深受全校老师学生的喜爱和尊重。为家乡培养出了众多的人才，获得社会的好评，被遂宁专员公署聘为督学（遂宁县志有记载）。

清末民初，遂宁工商业开始兴起，安居地处遂宁到成都的必经之路，又是成都与重庆，成都与南充等官道之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但那时交通非常落后，没有汽车，没有公路，交通工具都是靠人力和畜力。安居琼江老鹰岩与金鱼河两处是安居到遂宁的必经渡口，以前的安居桥又矮又窄，加之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如遇下雨涨水，商旅行人只能望河兴叹。这两个渡口犹如瓶颈，严重制约着安居

乃至遂宁的经济发展。

为了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促进安居的经济发展，当地士绅曾金如与曾春潭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决心解决安居交通的困难。他们与安居的士绅商议募集资金修复安居桥，由曾金如发起牵头，曾春潭积极协助，发动本地乡绅出资筹建安居大桥。

该工程庞大，需投入巨额资金。为了筹集建桥的资金曾金如与曾春潭等人克服了种种困难，八方奔走，做了大量艰苦的说服动员工作，终于筹齐了建桥资金。

为了早日建成大桥，曾春潭积极参与大桥的建设，亲自与建桥的工程人员和工匠在现场勘察设计，制定设计方案。他捐出大柏木 40 多根，用于桥梁和廊房之修建。经过三年施工，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大桥终于建成。桥高 3 丈 6 尺，长 30 余丈，宽 2 丈 7 尺计 13。桥上长亭覆盖琉璃瓦，其造型古朴，雕梁画柱金碧辉煌，工艺之精湛，工程之宏伟，在当时实为罕见。安居桥建成竣工之时，八方来贺，还特请了当时著名的书法家题写了匾额和对联嵌于桥头桥梁。

继安居大桥竣工后，曾春潭又与曾金如研究修建平政桥的计划。平政桥位于安居之东琼江上，清乾隆七年遂宁知县修建，垮塌后清末曾重修，因桥矮易被淹，遇稍大一点的雨就不能通过。重修平政桥的工程较安居桥更为庞大，设计全部用石头修建，其跨度又高又大，所需的条石为安居桥的六倍。因耗资巨大，建桥资金有缺口。为了早日将大桥建成，曾春潭将自己的竹子树木全部捐出，供建桥做拱架，搭工棚和抬石头的抬杠，还将自家种的七亩麻捐来做抬石的麻绳，建桥的百余民工，全部由曾春潭家提供食宿。工程历时五年，平政桥建成，彻底改变了安居的交通状况。

安居桥和平政桥的建设，为安居的经济建设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两座桥仍是成都到南充通道上的重要桥梁。

曾春潭为了平政桥的建设工程，五年来从大桥的规划设计，集资募捐到修建施工，他风里来雨里去，常年在桥梁工地上奔波，呕心沥血，倾其所有无私奉献，为家乡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深受家乡民众的尊重和爱戴。

1935 年，曾春潭被聘为遂宁县筑路委员会委员，负责全县公路桥梁的建设和乡村道路的修建，如从安居到聚贤的石板乡道路，就是在这个阶段铺成。在任筑路委员期间，他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严把质量关，他做事公正无私，工作

业绩突出，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他在安居创办首家平民纱厂，购置纺纱机 70 台，厂址设在太平寺。为了发展农村的经济，他倡导农民栽桑树，建蚕房养蚕。他在自己的土地上建苗圃，培育桑苗，无偿地将桑树苗送给农民，他还向农民传授桑树栽培和养蚕的技术，大力发展蚕桑养殖业，为安居的蚕桑业发展打下了基础，还带动了安居丝绸纺织业的发展。

当时农业生产技术非常落后，为了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他经过长期研究，改进了农田提水灌溉的工具，将人力大脚水车，改造为牛拉水车灌溉农田，这一技术获得成功，并在当地广泛应用，极大地减轻了农民劳动强度，保证了稻田水利灌溉，为提高了水稻单产打下了基础；他引进粮食优良品种，免费向农民兑换良种，使安居粮食良种的种植面积得以推广，提高了粮食单产；他学习晚稻种植技术，帮助家乡农民种植晚稻，增加粮食产量，提高了农民的收入。由于他对发展农业生产的突出贡献，1931 年曾春潭被特聘为遂宁县农会会员。

他关心民众的疾苦，致力于慈善事业，乐善好施。遇有疾病流行，他在安居镇上设施药点，熬制预防疾病的药水，免费让民众饮用，以避免疾病的传染爆发。如有贫困人家有人去世，因家庭贫穷无力安埋，他免费送棺木，使逝者得以安葬。

为了帮助贫困穷人，他购置了 40 脚踏台织布机，免费送给贫困人家，并传授纺织技术，让贫困人家通过劳动，增加收入，维持生计。

1935 年曾春潭被遂宁专员罗玺聘为遂宁县赈灾会查帐委员。1937 年川北遭遇大旱，遂宁三家、大坡、花岩、老池、东禅、栏江等地灾情非常严重，赤地百里，很多土地颗粒无收，一些农户断粮吃草根树皮，有的吃观音土（白泥巴），不少地方已经出现饿死人的现象。曾春潭与遂宁赈灾委员会的同仁冒着酷暑，走遍了灾区，了解灾情，掌握了灾区的第一手资料，向政府汇报。

通过曾春潭等人对灾区的调查，政府了解到灾区的真实状况，及时开展赈灾救济，发放救济粮，实行以工代赈等措施。对救济粮款的发放，他认真审查，做到了账目清楚，公平公正，保证救灾粮款发放到灾民手中。为了灾民得到更多的救助，他还四处奔走，发动豪门巨富及有钱人家，捐钱捐粮，设棚施粥，救济灾民。他的这些善举受到广大民众的称颂。

曾春潭很早就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他关心政治，思想倾向民主进步，拥护中国共产党。他的二儿子曾长青，在遂宁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在遂宁解放前夕，曾长青回到安居，开展革命活动，他与当时安居的中共地下党员邓志明、邓邻章、黄旭东等人交往密切，这几位经常在曾家里举行秘密聚会，每次来曾家都受到曾春潭的热情接待和支持帮助。

解放后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为安居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1966年曾春潭突发脑溢血去世，享年78岁。

曾春潭共育七子二女，他对子女要求严格，教育有方。二儿子曾辅中，黄埔军校第十八期第一总队毕业；三子曾伟堂，抗战时期在遂宁明耻中学读书时，立志报效祖国，参加了国民政府青年军，1944年被空军通讯学校录取，1949年赴台湾；五子曾长青，1948年考入遂宁师范学校，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在安岳乡镇和县卫生局工作；七子曾文志，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在武汉大学任教。

他的孙辈们更是人才济济，兴旺发达。很多人在政府部门、大学、科研机构等部门工作，在各条战线上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奋斗，还有多人在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国从事教学、科研等工作。

曾春潭先生一生，为了安居的建设和发展，积极奉献，努力奋斗。他对人谦和，胸怀广阔，淡泊明志，思想敏捷，始终站在历史的潮头超越自我，在安居的教育，交通，农业、民生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推动了安居教育事业和经济的发展。他那高尚的品德，为社会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曾春潭么女曾文英，曾多次委托其遂宁一中同学刘耀空老师，希望刘老师能将父亲曾春潭的事迹用文字记录下来。刘耀空老师体弱多病，再加之他要完成一部长篇小说，故请我为其完成该作品，我欣然接受。2017年我和刘耀空老师到曾文英家中作了采访。

注：本文资料来源

1. 曾氏族谱
2. 遂宁县志
3. 曾文英口述

作者：谢明铎

电话：13882558828

邮箱：441738436pp@.com

住址：遂宁市城区公园中路 18 号

（共 3286 字）

风华绝代：未曾远去的黄峨

撰稿：罗贤慧

故事的开篇，在明朝正德六年。这一年的春天，对于四川文学史来说，有两件事值得狠狠记上一笔。

一件大事，是当朝首辅杨廷和的大公子殿试高中状元，明武宗钦赐朝服冠带，授官翰林院修撰——这位公子就是后来的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慎杨升庵。

还有一件小事，顶小顶小的事，工部尚书黄珂府中小姐的绣房外，一只蚂蚁爬上了东墙。可这算个什么事呢？蚂蚁上墙，屎壳郎推粪，天经地义，何值一提？可是那天，恰好天高云淡风清气朗，恰好园子里一树红梅正开得灼灼夭夭，恰好一只小蚂蚁吃饱喝足心情一高兴就想趁着好天气晒晒太阳。要晒太阳当然找向东的山墙，拖一片梅花瓣上去，正好当睡床。想想看，嘿！那小风儿吹着，小床儿摇着，怕是做个梦都满嘴流香！说干就干，这只蚂蚁开始动工了。可能是它“诶咗！诶咗！”的号子声惊动了闺房里豆蔻妙龄的小姐，小姐小心翼翼地按捺着雀

跃的芳心，欹进软烟罗糊过的雕窗，拔下发间丹凤含珠的金钗，向窗纸轻轻一探——窗纸“啾”地一声透开一个细缝，一缕梅香挟着窗外的无边春色倾泻而入。小姐心里蓦然间万花齐放。可了不得！原来窗外竟是这样大好的春光！心中一动，小姐捻起白居易赞过的紫毫笔，展开薛涛染过的松花笺，罗袖微拂，皓腕轻舒，飒飒写下几行小诗：

金钗笑刺红窗纸，
引入梅花一线香。
蝼蚁也怜春色早，
倒拖花瓣上东墙。

这位小姐芳名黄娥，小字秀眉，后来成为明代最著名的女散曲家，人称“曲中易安”，与卓文君、花蕊夫人、薛涛并称为“蜀中四大才女”。

这两件事本来没什么关系，可也许就在这个春天，冥冥之中上苍便有了安排，一根无形的红线牵引着这一双才子佳人不断走近，并最终在四川文学史上留下两座并立的高峰，在中国文学的百花园里开出一枝并蒂奇葩。

我知道安居有个黄娥，不过是近十年的事。在此之前，中学时代就唱烂了卓文君的《白头吟》，专程到成都望江楼公园拜望过薛涛墓，甚至连花蕊夫人的故事也在听闻“芙蓉城”的来由时略知一二——“蜀中四大才女”，我竟独独对这位安居“同乡”一无所知，实在是该狠狠惭愧一回。所幸的是，最近十余年因为地方党委政府的不懈努力，“黄娥故里”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如我这般生在安居却不知黄娥为何许人的怕是不多见了。

至今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当年第一次读到黄娥作品的情景。那天，我无意中在办公室翻到一本宣传画册，封底是一首曲谱。曲谱的名字已经不太记得了，但歌词却让我惊艳：“金钗笑刺红窗纸，引入梅花一线香。蝼蚁也怜春色早，倒拖花瓣上东墙”——正是黄娥的成名作《闺中即事》。

后人对她这首诗颇有推崇，说诗中充满少女的天真烂漫，观察细致，技巧高明。可不知为何，我每次读到这几句诗，总不免想起《牡丹亭》里杜丽娘的唱段：“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名

门闺秀又如何？才华横溢又如何？在那样的时代，终究只能困于深闺，良辰美景空自流逝，美好青春生生禁锢。窗外春色再好，也不能涉足一望，只能悄悄从窗纸缝里透进一丝春的气息，连一只可以自由翻过东墙的小小的蝼蚁也不如！这样的黄娥，让人心动，也让人心痛。

之后我便有意搜寻她的诗作来读，越读越对她的品貌超绝、才高于世无限倾慕，越读越为她的运途多舛、孤苦一生叹惋唏嘘。

黄娥写下《闺中即事》那一年，芳龄十二，正值豆蔻芳华。小小年纪的她以诗曲名动京城，人人皆知工部尚书黄珂有一位天资聪慧、才华横溢的掌上明珠，长辈们甚至常比喻她为东汉时的女才子班昭。

直至黄娥及笄，不少官宦子弟、风流少年都慕名而来，提亲的人几乎要踏破了尚书府的门槛。但黄家小姐一直臻首低垂，不肯应允，她心里早有中意人选，正是当年高中榜首的新都状元——杨慎。只是杨慎此时已有妻室，尚书府的明珠自然不能委身为妾，可黄娥偏自认定非新都状元这样的才子不嫁。尚书心疼女儿，便也由得她待字闺中，镇日吟诗弄曲。

这一等就把黄娥等成了“大龄剩女”，直到双十之年仍云英未嫁——这样年纪的女子，在当时绝对算是“齐天大剩”了。或许姻缘自有天定，黄娥二十岁这年，杨慎的原配夫人王氏病故。杨廷和早知工部尚书黄珂有位名冠京城的女儿，又闻其年方二十仍待字闺中，便遣人到黄府提亲。黄杨两家本就是朝中同好，又是四川同乡，向来相交颇深，所以亲事一说即成。

第二年，杨府备办了丰厚的聘礼，升庵亲往黄府迎娶佳人。彩轿抬回新都，倾城震动，万人空巷，人们都争先恐后来看这位“尚书女儿知府妹、宰相媳妇状元妻”的绰约丰姿。至此，冥冥之中那条红线终于把两人紧紧系在一起，成就了一段后世佳话。

黄娥与杨慎结为伉俪后，既是同心诗友，又是恩爱夫妻，朝夕切磋诗文，填词作曲，清风明月，花前月下，真真是过着童话般幸福浪漫的生活。

可是正如电影《大话西游》里那句著名的台词：“我猜中了开头，可是我猜不着这结局。”好景不长，他们婚后第六年，因为“大议礼”事件，杨廷和被迫辞官返乡，杨慎也于“中元日下狱，十七日廷杖之，二十七日复杖之，毙而复苏，

谪戍云南永昌卫。”曾经煊赫一时的新都杨氏就此门庭败落。

杨慎谪戍永昌后，夫妻二人三十多年天涯远隔，其间只有嘉靖五年到七年，黄峨随杨慎在蛮荒之地有短暂的相聚，度过了三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嘉靖 38 年（1559 年），年过古稀的杨慎含恨死于一座破败古庙之中。黄峨闻讯，千里奔丧，接回灵柩，自制哀章《祭夫文》，声声泣血，字字含悲。此后，黄峨独力操持家族事务，抚养子侄，“诗不多作，亦不存稿，虽子侄不得见也”（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直到嘉靖四十五年（1565），明世宗晏驾，裕王朱载堉即位，次年改年号为隆庆。“大礼议”获罪诸臣终获宽赦，杨慎在死后七年被恢复原官，并追赠为光禄寺少卿，后来又谥封为文宪公；黄峨也由安人晋封为宜人。明隆庆三年（1569 年），黄峨病故，享年七十二岁，死后与升庵合葬，践了当年“生而同心，死而同穴”的誓愿。

我曾两度去到新都桂湖，在黄峨与杨慎当年生活过的地方驻足流连。隔着 500 年的岁月长河，我仿佛还能看到那一对燕尔新婚的璧人在湖畔吟诗论文，琴瑟相和。

桂湖以“桂”得名，四周多植桂树。每到秋来，桂花盛开，暗香盈袖。二人相携游湖，赏月看花。升庵摘下一枝新桂，插上黄峨乌黑的发髻，随口吟来：

银汉无声下玉霜，
素娥青女斗新妆。
折来金粟枝枝艳，
插上乌云朵朵香。

桂花高洁素雅，传说中天上最美的仙子——嫦娥居住的广寒宫中就植有一棵桂树。唐朝大诗人宋之问更有名句“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想必在杨升庵当时的眼里心里，黄峨也是天上的嫦娥仙子一般倾世绝艳吧。

他们居住的小院谓之“榴阁”，濒临桂湖，雅静清幽，因庭中栽有一株石榴树而得名。初夏，石榴满树繁花，艳丽无匹。黄峨看那枝头绯花掩映，明艳如霞，看似蹉跎春风，偏要等到夏季才盛放仙姿——岂不正如自己，为了意中人苦等十载，直到年过二十才迟迟“大龄”婚嫁？她把这心思写进了那首《庭榴》诗：

移来西域种多奇，
槛外绯花掩映时。
不为秋深能结实，
肯于夏半烂生姿。
翻嫌桃李开何早，
独秉灵根放故迟。
朵朵如霞明照眼，
晚凉相对更相宜。

坐在石榴树下，我又想起这首诗，想象黄峨当年捧出诗笺给杨升庵的情景。石榴籽粒众多，在古代民间向来象征着“多子多福”的吉兆。黄峨这首诗，是写石榴，更是写她自己。把这样一首诗奉给夫君，新婚燕尔的黄峨必定是情意缠绵又满含羞怯的吧？乃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分明感觉到那字里行间火热纯真的爱情，和新婚少妇明媚丰盈的幸福与喜悦。

真真是神仙眷侣，引人神往！

只可惜，安居虽为黄峨故里，如今却难以找到一处留有才女芳息的遗址遗迹。倒是有一座黄坟山，相传为黄峨之父黄珂的墓葬所在地。

据民国本《遂宁县志》记载：“工部尚书黄简肃墓，在土桥铺。”另据史志记载：“黄珂(1449—1522)，字鸣玉，明代遂宁西眉镇北六里黄安桥黄榜石人……葬遂宁土桥铺（今安居区聚贤乡）鸣钟山。”这鸣钟山就是现在的黄坟山。当地人知道：“山上有座坟，以前埋了一个姓黄的大官。那坟叫黄坟，山就叫黄坟山。”

因为黄峨的缘故，我特意去黄坟山做过两次探访。

严格说来，黄坟山其实不能算“山”，顶多是一个土坡，就在聚贤镇政府往金井沟村方向大约1公里的地方。

据当地老人们说，山下原来有一座牌坊。牌坊两丈多高，是传统的三间四柱式；中间是正门，宽约丈许；两边各有一个侧门，能容一抬轿辇通过。牌坊是石质结构，四根石柱每根都要两人才能合抱。牌坊上雕刻有繁复的花纹，还有几个大字。过了牌坊就是一条石阶，一直从山下通到黄珂的墓地。石阶全是用上好的

青石板铺成，两米多宽，两边都有石质护栏，还立着石人、石马，都塑得栩栩如生。石阶的尽头是一个祭祀的平台，大约六七十平米，也是青石铺就。平台前面就是黄珂的墓。墓是圆顶方基，也是青石垒砌而成，墓高两米多。墓前三座石碑，中间一座最高，是主碑，两侧各有一块陪碑，上面刻着大段祭文。

黄坟在修建之后的几百年里一直保存完好，年节清明时还不时有人前来祭祀洒扫。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牌坊在文革初期“破四旧”运动中被拆。十多年后，坟墓也在七十年代改田改土活动中被拆毁、开掘。

如今，“黄坟”早已不在了，只剩黄坟山一个徒有其名的旧址。当初墓地上那些青石，有的被运到500米外的玉带河上做桥墩，有的被运到现在聚贤小学背后的文昌堰做堡坎石，有的被当地人拉回家砌猪圈、垒鸡窝；还有的四散零落，被扔在竹林窠里、乱草丛中，或者埋在了层层红土之下……

当地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还清楚地记得当年黄坟的样子。甚至五十多岁的人，也都记得年幼时在那些石人石马上爬上爬下游戏玩耍的情景，都能说出当年土改运动全村人围观“挖黄坟”时堪称“壮观”的场面。只是那些牌坊和石碑上的文字，却没有一个人能准确地说出，大多数人是因为当年根本不识字，还有一些人即便当年认得，时间久远也记不清了，实在是让人扼腕！

在黄坟旧址，我看到两棵并肩生长的泡桐树，花开时节早已过去，叶子倒是一片葱茏。微风起时，片片叶子如无数翻动的手掌，哗哗有声，让人想起舒婷笔下的橡树和木棉：“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黄峨与杨慎，就是这样两棵并肩站立的树吧，在岁月的风刀霜剑中，根系紧握，枝叶交触，互相鼓励，互相慰抚，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站成了一道不可磨灭的风景……

网上曾经流行过一句“鸡汤文”：“那些没能打败你的，终将使你更强大。”这句话放在才女黄峨身上，再合适不过。都说“悲愤出文豪，苦难出诗人”，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黄峨的人生可以说是哀鸿遍地，可她愣是用内心的坚定和美好战胜了生活给予的重重重击，从苦难中开出绝美的花来。

嘉靖三年深秋，黄峨得到杨慎被贬永昌的消息，便誓与夫君同生死共患难。夫妻二人乘船沿北运河向南行驶，一路不止冒着风霜苦寒，更是屡遭朝中奸佞的

伺机暗害，甚至在路过繁华富庶的游冶胜地时也不例外。“荒村聚豺虎，夹岸鸣蛟鼉。畏途险已出，胜地心犹惊。”谁能想到，这是曾经的“尚书女儿知府妹、宰相媳妇状元妻”在秦淮扬州写下的诗句？

隆冬时节，船行至江陵，杨慎将由此登岸，经湖南、贵州转道云南。想到此后山川险恶，道路崎岖，他不忍累及爱妻，坚持要黄峨顺长江回蜀。冒着朔风飞雪，一对苦命伉俪立于江陵古渡，情之所至，又以诗曲寄托心中万千情思。杨慎悲吟出一首《临江仙·江陵别内》：

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征骖去棹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却羨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河洲。今宵明月为谁留，团团清影好，偏照别离愁。

黄峨更是悲泪纵横，气断声噎，以一首《越调斗鹤鹑》悲情相和：

分手东墙，送君南浦。目断行云，泪添细雨；载恨孤舟，戛愁去橹。厮看觑，两无语。当时也割不断那样恩情，今日个打迭起这般凄楚。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更何況，此去经年不知何时能见，甚至不知此生还能否相见。此间悲恸，虽为生离，更胜死别！这些痛楚如何消解？“愤于中而形于外”，忧思哀痛于心，自然愤悱启发于外：

空庭月影斜，东方亮也。金鸡惊散枕边蝶。长亭十里、阳关三叠，相思相见何年月。泪流襟上血，愁穿心上结，鸳鸯被冷雕鞍热。

后人皆赞这首《罗江怨》情致生动，可谁知黄峨与升庵别后的孤苦境况？只看曲尾那一“冷”一“热”，“冷”的是黄峨闺中独守的茕茕伶仃，“热”的是升庵贬谪戍所的路途艰难，一个孤独，一个仓皇，这是比“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更哀绝百倍的凄楚悲凉啊！

无数个不眠之夜，黄峨只能在给丈夫写信和盼丈夫来信中苦苦熬过，然而万水千山阻隔，就连一纸音书也是难得一见！“锦瑟年华谁与度，铁作心肠泪似珠，不见他一纸来书”（《越调·圣药王》），“衾如铁，信似金，玉漏静沉沉。万水千山梦，三更半夜心”（《越调·圣药王》），“陇驿传梅隔，池塘梦花怯，窗案灯花谢，难打熬无如今夜”（《梧叶儿》）……盼归不至却又难寄相思，黄峨留下的这些诗曲之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那首《黄莺儿》：

积雨酿春寒，看繁花树残。泥途江眼登临倦，云山几盘流几弯，天涯极目空

肠断。寄书难，无情征雁，飞不到滇南。

黄娥的诗曲甚至比她的丈夫杨慎写得还好，相传杨慎收到这首《黄莺儿》之后，连和三首，自叹“皆不及也”。暑去寒来，归期遥遥，这位大才子只能悲叹“相思离恨知多少，烦恼凄凉有万千”，“易求海上琼枝树，难得阁中锦字书”。

或许，人经受的苦难足够深，那些被伤痛千万次撕咬折磨的心都能口绽莲花，出口成诗，黄娥便是其中之一。“在散曲史上，黄娥是最出色的一位女作家”（《中国古代散曲史》），她的作品不仅在艺术特色上成就不凡，堪称字字珠玑；而且数量颇丰，据《全明散曲》统计，黄娥现存小令 63 首，套曲 6 首，与当时号称“北曲之冠”的王磐几乎旗鼓相当。可如果命运可以选择，谁会愿意用一生安乐去换那所谓的“万世才名”？不止是人，就连神仙也不会甘心情愿做这种选择吧？君不闻舒婷那首《神女峰》中怎么说来？“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杨慎古稀之年含恨死于一座破败古庙。黄娥惊闻噩耗，以花甲之年羸弱之身，徒步赴云南奔丧，在泸州接到升庵的灵柩，悲恸万状之下自作哀章祭夫亡灵，闻者无不垂泪。升庵逝后，黄娥“诗不多作，亦不存稿，虽子侄不得见也”。

或许，她的旷世才情，从来都只为那一人绽放。

世人常称黄娥为“曲中易安”。两位旷世才女在许多方面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一样的出身显贵，一样的才华横溢，一样的命途多舛，甚至连她们的文学创作轨迹也几近相同。

李清照的诗词以南渡为界，黄娥的诗曲以“大议礼”事件为界。二者前期作品都比较婉约隽秀，清新明丽，内容多写爱情生活、自然风物；而后期作品则多为感时伤世，风格或沉郁苍凉，或忧思悱恻。

黄娥早年的代表作《闺中即事》，很容易让人想到李清照那首《点绛唇》：“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入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诗中都活脱脱跳动着一个天真纯洁、春情萌动却又带有几分娇羞矜持的少女形象。

李清照有一首《减字木兰花》，写她和赵明诚新婚不久的一件小事。词云：“卖花担上，卖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尤带彤霞晓露痕。怕郎猜道，奴面不

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无独有偶，黄峨也有一首《巫山一段云》。曲云：“巫女朝朝艳，杨妃夜夜娇。行云无力困纤腰，媚眼晕红潮。阿母梳云鬓，檀郎整翠翘。起来罗袜步兰苕，一见又魂销。”曲作描绘少年夫妇新婚燕尔闺房生活的欢乐甜蜜，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乐而不淫、轻而不俗，与《减字木兰花》有异曲同工之妙！

李清照的一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以妙用叠词一直为后人称道。可知黄峨有一首《天净沙》比这更奇：

哥哥大大娟娟，风风韵韵般般，刻刻时时盼盼，心心原原，双双对对鹣鹣！娟娟大大哥哥，婷婷袅袅多多，件件堪堪可可，藏藏躲躲，哝哝世世婆婆。

曲作通篇采用叠词，音韵铿锵，节奏明丽，把一群少年男女追求心爱之人的情景描绘得风致翩翩，妙趣横生。

李清照被称“婉约词宗”，堪称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女词人；黄峨人称“才艺冠女班”，被称为中国“散曲史上最出色的一位女作家”。两位奇女子，以绝世才情在中国文学史上树起了两座辉耀百代、光照千秋的不朽丰碑！

与历代著名才女相比，黄峨似乎缺了点鲜明锋利的性格——就拿其他蜀中才女来说，黄峨既不像卓文君那样冲动得惊世骇俗，也不像薛涛那样潇洒得自由自在，更不像黄崇嘏那样勇敢得离经叛道，甚至不像花蕊夫人那样美丽得惊天动地。很多时候她就是一个安安分分、纪纲持家的主妇，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担纲家族重任、教抚幼子孤侄。钱谦益在《历朝诗集小传》中评价她“娴于女道，性复严整，闺门肃穆”，《古今图书集成·闺媛典》中说她“守礼有识鉴”，就连丈夫杨升庵也赞她是“女洙泗、闺邹鲁”。

然而她性格中不容忽视的还有深明大义、乐观坚忍、磊落耿介等元素，这些可贵品质为她的文学创作平添了一抹动人的光辉。

杨慎被贬永昌，难免心有不平，郁愤难消。黄峨情知夫君心境，写下书信鼓励他不要因为被贬边陲蛮荒之地就放弃斗志，不要因为离愁别恨的儿女私情妨碍“公义”，鼓励他早日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丈夫本是四方客，妾为离愁心似结。公义私情不两全，愿君早向凌烟勒。”既多情温柔、善解人意，又知书识礼、深明大义，此等眼界胸怀，实可睥睨世间小

儿女千里之外。

即便是在黄娥最为痛苦难捱的时候，一面要忍受夫妻分离的刻骨相思，一面要独自承担起纪纲家事的重担，一面还要应对诸多罪臣眷属必然遭受的冷遇和苦难，她的诗曲里也总是透着希望：“你留恋时咱留恋，天有缘时人有缘。玉骢嘶逢着红妆面，才是我相思债俩满！”她始终坚信会有守得云开见月明的一天。正是这种坚忍乐观，支撑着她以一副柔弱的肩膀支撑起败落后的杨氏家族数十年。

当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古巴山蜀水滋养出的女子都以“辣”闻名，即便幼承闺训、出身世家的黄娥也不能例外。

杨慎年近半百的时候，为了得子替役，早日还乡，先后于嘉靖十三年、嘉靖二十一年纳妾周氏和曹氏。在初闻杨慎纳妾之时，黄娥曾写下一首《雁儿落带过得胜令》，那就颇像一道有名的四川小吃——川北凉粉，“辣”劲十足，堪称淋漓酣畅。曲云：

俺也曾娇滴滴徘徊在兰麝房，俺也曾香馥馥绸缪在蛟绡帐，俺也曾颤巍巍擎他在手掌儿中，俺也曾意悬悬搁他在心窝儿上。谁承望，忽刺刺金弹打鸳鸯，支楞楞瑶琴别凤凰。我这里冷清清独守莺花寨，他那里笑吟吟相和鱼水乡。难当，小贱才假莺莺的娇模样；休忙，老虔婆恶狠狠地做一场！

曲词用明白如话的市井语言，忆往昔她在兰麝房里、蛟绡帐内，被丈夫敬着、抱着、捧着、疼着，如掌中明珠、心上朱砂，现如今他却笑拥新欢，沉醉巫山，忍不住告诫新人“休忙”，“俺”可要“老虔婆恶狠狠地做一场”！

这味道，够辣不？个性倔强、刚毅决断、敢爱敢恨，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曲词在那样的时代，会是怎样的惊世骇俗！但这种“辣”不仅无损于她的多情温柔、善解人意，反而让我们看到她的性格中更加真实、更加丰满的一面——这样的事情，换作任何一个正常女子，怕都是不能欣然接受的吧。

黄娥能文工诗，尤擅词曲，万历版《杨夫人乐府词余》序中说“夫人篇什，云蒸霞烂”，称她“才情甚富，不让易安、淑真”；明代大戏曲家徐

文长称赞她“才艺冠女班”，说她的曲词“旨趣娴雅，风致翩翩，填词用韵，天然合律”，“予为之左逊焉”。她的诗曲大都来自人生际遇的真实感受，少女时期《闺中即事》的活泼天真，《莺莺》诗中对自由恋爱和美满姻缘的向往；即便后期作品大多与“离情”相关，但与温庭筠、柳永的缠绵浓艳也大不相同。她的曲辞善用对比，大起大落，大开大合，常如破闸洪水，一泻千里，奔腾咆哮，痛快淋漓，这一点上倒颇有几分男儿气概。

如今常有人只读了黄娥的几首诗曲，就断章取义，说她只是一个“闺中怨妇”，她的作品都是“怨妇诗”，这实在是大大的冤哉枉也！

在探访黄坟山的时候，我还听到一个传说。早年从遂宁县城到聚贤镇，必须翻过一个又长又陡的垭口。最初那个垭口的名字叫“手势垭”，因为山上山下距离遥远，人们喊话必须用手比划着才能听懂。有一年黄娥回乡祭祖，正要翻过“手势垭”，却遇到一个本地乡绅从对面过来。过垭口的那条小路狭窄陡峭，两台轿辇根本错不开。乡绅听说对面轿中坐的是黄娥，连忙招呼轿夫停下，小心翼翼退到路边，让黄娥先过。黄娥心有所感，取下随身的首饰，让随从交给那位乡绅，请他帮忙把小路重新修整，方便人们通行。后来，人们为了怀念黄娥捐资之情，就把“手势垭”叫做了“首饰垭”。

这个传说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如果是真，从黄娥还乡祭祖还有随身轿辇和仆从可以推测，应该在杨氏一族因“大议礼”事件获罪之前；黄珂于1522年辞世，距“大议礼”事件只有两年，然而我在史志上并没有查到黄娥夫妇在此期间还乡的记载。如果是假，“首饰垭”这个地名和这个传说却是当地老百姓口中代代相传，不像空穴来风。不管是真是假，这个传说，都寄托了家乡百姓世代对这位才女的思慕和感念。

《红楼梦》中晴雯离世，贾宝玉以一首《芙蓉女儿诔》相祭，至情至性，催人泪下。我虽有心学曹公，奈何才疏识浅，斗胆学填《莺啼序》一首，祭告才女芳魂：

常言锦屏绣户，把韶光看贱。东邻外，黄氏嘉娥，紫苑帘幕轻卷。舒皓腕，金钗漫刺，红窗透入香一线。看墙头蝼蚁，也怜芳春无限。

杨氏升庵，状元年少，赫赫人称羨。成眷属，并蒂花开，同心诗侣名显。桂湖边，如烟柳色；榴阁外，花红千片。共逍遥，池上鸳鸯，梁间双燕。

奈何人世，虎兕当途，良辰多苦短。议大礼，用修遭祸。千里送夫，梦断江陵，泪零如霰。关河梦近，天涯路远，回文尺素凭征雁。忆当年，花面映人面。而今只问，帐中被为谁温，镜里鬓为谁绾？

永昌古庙，三十八年，怅恨忠魂散。接灵柩，祭章哀婉。字字含悲，句句噙血，声长气短。桑榆已晚，凄风残月，孑然只影再无伴。诉才情、君有千千万，偏生途运多艰，天妒红颜。一声长叹！

弄斧班门，聊寄悼思，愿一代才女泉下魂安！

易亨良

为了向建国 70 周年献礼，笔者采写了这篇《拦江“九路军”覆灭纪实》。为真实、全面地反映解放初期那场征粮剿匪斗争，笔者实地考察了当年九路军所经过的三合寨、真武山、接绍寺、骑龙店洛阳桥等地，走访了拦江镇，乐至县新建乡、大英县河边镇八旬以上老人 80 余名，他们当中有的是战斗的参与者，有的是战斗的目睹者；另外，专程两次赴遂宁拜访当年参加战斗的易震东先生，并参阅了罗年春、许国华、刘安治等前辈的回忆文章。在此，笔者向提供口碑资料和文字资料的前辈致谢，并恭请知情前辈指正遗漏与谬误。拦江与乐至、现大英等县边界相连，是遂宁的棉花、食盐主产区，集市贸易比较发达，解放前就有大小店铺近百家，逢场赶集的人常达数千，其中还有不少临近县乡的人在这边远热闹场镇上，封建势力较大，主要权力被刘、罗、王三大姓中的恶霸地主所把持，他们常以苛捐杂税、拉丁派夫、放高利贷，压榨剥削农民。还与土匪流氓相互勾结开设妓院、烟馆、赌场，甚至暗设匪棚，打家劫舍，掌红吃黑，称霸一方。解放后，他们又逆历史的潮流而动，组织“九路军”武装暴动，妄图夺回已经失去的“天堂”，最终逃脱不了彻底覆灭的命运。

“九路军”出笼

一九四九年遂宁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政府预感到他们的末日将至，加紧采取应变措施。首先由川中师管区在遂宁举办了“反共游击队干部训练班”（简称游干班，公开名“自卫队干部训练班”。县为总队，乡镇为大队，除配专职大队长外，乡镇长任兼职大队长，乡镇以下设中队、分队若干。在游干班里大肆进行反共宣传，集体发展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要求他们效忠国民党，配合正规国军，阻扰解放，对我新解放区进行扰乱破坏。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反动基层政权的控制，又把拦江镇的 64 保分为三个乡。罗静轩任拦江乡长，王伯达任崇胜乡长，罗旭初任广福乡长。三乡反动头目，除大肆进行反共欺骗宣传外，一面加紧组建和训练“自卫队”一面加紧控制拦江哥老会（俗称袍哥）组织，并由旧乡长和当地有一定名望的恶霸地主

分别开山立旗,组建分会。在真武山(原真武二村)成立“双合宫”,在接绍寺(原真武五村,又名吉照寺、鸡叫寺)成立“瑞仁宫”,在瓜瓢寨(原广福乡)成立“广益宫”,利用袍哥组织,打着“桃园结义”的旗号,欺骗群众,加强地方反动势力(包括地痞流氓)之间的相互勾结。除自卫总队给各乡自卫大队增发枪枝弹药外,他们还鼓动部份土匪和恶霸地主从国民党脱兵手中

购买枪枝弹药,为开展反共游击战争作准备。国民党的回乡军官“励克社”在拦江的总头目夏中孚,还在拦江正街其家门前公开挂出过“反共游击队营部”的牌子。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遂宁县城的国民党军警部队和专署县府的官员慑于人民解放军入川神速之威力,纷纷弃城逃跑。十二月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三兵团三十三师在潼南县的双江太安歼灭胡宗南部第一军第十八师后,先头部队于十二月八日开进遂宁。由中共遂宁地下党组织指挥各界代表人士组成的“遂宁县临时治安委员会”发动了数千学生和市民,敲锣打鼓,手舞彩旗,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等口号,夹道欢迎解放军。在三十三师师长童国贵、政委高治国、参谋长孟惊宇等领导的提议下,将“遂宁县临时治安委员会”更名为“遂宁县解放委员会”。在县城和各乡镇四处张贴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解放全中国的《命令》,解放军的《约法八章》,解放委员会的《告全县人民书》,宣告遂宁解放。九日中共地下党川北工委委员遂南中心县委书记、人民解放军川北游击纵队司令王子度等回城开展工作。地下和南下的同志会师之后,经上级批准,1950年1月3日中共遂宁县委员会成立,李容任书记,1月5日遂宁县人民政府成立,冷绍成任县长、范艾任副县长。迅及在全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征粮支前”工作。一九五零年二月遂守县第三区(东禅区)人民政府成立,贺枝贵任区长,许国华任副区长。拦江等乡属东禅辖区。许国华率征粮工作队到达拦江,指挥拦江、分水等乡征粮工作。当时留用的旧乡长罗静轩等人,对征粮支前表面应付,暗地与乐至县的雷一鸣(曾任国民党军队少校副团长)白马乡的谭果维(曾任国民党军医官)等人勾结,密谋“造反”。雷向罗等自吹与罗广文刘文辉(事实上刘、罗将军都已率部起义)是拜把兄弟,他们都是从美国进口的枪炮,武器精良,发报机也很多,知道蒋委员长很快就要打回来了,我们现在马上联合起

来干大事,把共产党的干部搁翻,把交椅夺过来蒋委员长回来少不了给你一个县长,谭也随声附和,罗等听得心花怒放,当即答应。罗静轩分别与罗旭初、王伯达等人密谋,他们臭味相投,一拍即合,很快把分散在各处的反动党团骨干、袍哥骨干、土匪、兵痞、恶霸地主的家丁等纠合拢来,雷一鸣和谭果维第二次来拦江时,便宣布成立了拦江“九路军”(意即比八路军人多、枪多、路也多),并加紧准备,待机暴动。

拦江暴动

许国华率领的征粮工作队,多是一些新参加革命工作的进步青年,工作积极性高,特别是许国华作风严谨,工作细致,不畏艰苦,平易近人,群众无不称赞,一天许在拦江河边,一面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面洗衣,引来不少群众观看,都说“共产党的官衣服都自己洗,肯定是为群众办事的”。工作队和部份革命教师组成的宣传组,向农民宣传了征粮的政策意义,深受群众欢迎,广大农民和开明士绅都愿踊跃交纳爱国公粮。当时乡村新政权组织还未建立,留用的旧乡保甲人员,多数亦积极参加催粮工作,争取立功补过,求得群众对他们在旧社会过错的谅解与宽大,很快掀起了交纳公粮高潮。这时,反革命谣言也暗地流传,攻击诬蔑“共产党要共产共妻”、“蒋介石要回来了”、“九路军比八路还凶,共产党的日子不长了”等等,威胁恐吓群众。工作队及时向东禅贺区长汇报情况,同时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变化。

1950年2月22日(农历)是拦江的逢场天,又在演戏赶场买卖物品和看戏的人都很多。各乡保长也要到工作队驻地碧云宫(现拦江粮库)汇报征粮工作进展情况。上午突然有人送给许国华一张纸条:“注意,今晚有事”。许仍非常镇定,照常开展工作,并嘱武装人员加强警戒,不准可疑人员入内。天快黑时,一工作队员发现“小桥坡上有背枪的人”。许国华立即向东禅贺区长报告,并安排易震东等上街了解情况,了解土匪人数和枪枝等实力。同时发现碧云宫门外有二人打架互相扭扯不放,申言要到碧云宫找许区长解决,行迹可疑,门卫坚决未准其进入,并劝其离开。不久许国华又亲自带领工作队员陈德、聂纯农、王超然上街了解情况。易震东在往小桥坡途中,刚到小桥边,便听到会元桥上一声枪响,紧接着拦江场镇四面坡上枪声大着,喊声四起,腰系白毛巾的匪徒一边开枪一边乱叫“共产党

不要群众一针一线只要粮食和银元”“活捉许国华”等反动口号往拦江场镇冲，情况十分危急，易震东见此情景迅速跑进文昌宫（现拦江镇中学）内向工作人员蔡仁辅家询问情况，被蔡家锁在房里掩护起来。

原来，谭果维、雷一鸣、罗静轩等人于早几天便在广福寺

（袍哥广益宫堂口所在地，即老广福一村，现被麻子滩水淹没）策划2月22日拦江暴动，“活捉许国华，杀死所有工作人员，破坏征粮工作，暴动成功后，抢劫所有拦江商店，购置武器，扩充实力，占领拦江，迎接蒋介石光复大陆，暴动时间以枪声为号”。趁22日逢场天，九路军带武器化装成百姓进入拦江场镇，隐藏在各茶馆里。傍晚时分派九路军骨干“刘大眉毛”等到碧云官门外佯装打架，企图达到把许区长引出来活捉，由于许国华警惕性高未入陷阱。晚饭后，九路军见许区长带人上街，又故伎重演，易震东上前制止，许国华等人绕道至会元桥时，见一人神色慌张，许国华有意往那人身后一靠，发现有枪，向陈德一打手势，陈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下了对方的“可尔提”手枪，对方拔腿就跑，许国华高喊“站住！再跑毙了你！”许国华朝天鸣枪，四面坡上及场镇埋伏的九路军以为是暴动的信号，于是枪声骤起，坡上的九路军腰缠白毛巾一边乱打枪一边狂呼乱喊向街上冲，许国华、陈德、王超然聂纯农四人腹背受敌，他们在许的指挥下一边英勇还击，边向碧云宫撤退。当他们途经半边街的拐弯处一蔡氏茶馆时，隐藏在这里的九路

军分子投出一颗手榴弹，幸未爆炸，几个土匪又向许国华开枪，许右手膀中弹，但仍坚持战斗。终于打开了一条路，许等退回到工作队驻地碧云宫，与区干队（前身是自卫队）队长廖国凡会合。此时电话线早被截断，考虑到敌我力量悬殊，工作队除许国华、陈德、郑玉泉三人当过兵打过仗外，其余全是学生，教师，区干队又是旧政府的自卫队改编而来，虽有数十人，但也未打过仗，并且不少人思想不稳定，为了保存实力，便指挥工作队退守寨子坡（碧云宫后面，现拦江电视差转塔所在地）。

工作组刚一撤走，九路军就杀进碧云宫，抓住撤退不及的工作人员唐明武（乐至县石佛乡人），抢走电话机，烧毁征粮册，掠

走一切生活用品，不能带走的东西一律砸烂。并沿街挨家挨户

敲门威胁居民：赶快把罗年春、许国华交出来！若搜出来要活埋全家，血洗拦江河。下半夜，九路军将唐明武吊在小桥边的黄桷树上，严刑拷打、逼供，拷问罗年春与许国华的下落，（罗年春与刘光寿奉命已于二十二日早上赶赴东禅），但唐明武宁死未招供。半夜时分，被困在寨子坡内的工作组和区干队在许国华的指挥下坚守阵地，下面的九路军一面向寨上放枪，一面向寨上喊话：“自卫队（区干队的前身称自卫队）的兄弟们，跟共产党绝没有好下场，我们已经把你们的头儿罗年春活捉了，同我们作对的全家猫儿耗子都杀完。”经敌人威胁煽动，渐渐地，寨子坡上的枪声稀少了，有的区干队员放下了枪，借口说子弹没有了，区干队长廖国凡（保石人）大吼“哪个龟儿子叫没得子弹？哪个龟儿子敢投降，老子就地处决”，但仍有一部份弃枪逃跑，有个别带枪跑到九路军阵营里去了，许国华带领剩下的 13 人继续坚持战斗到下半夜，许见敌我力量悬殊，为了保存实力，决定撤出寨子坡，退守上场口碉堡内（上场口的碉堡当时属拦江盐务所盐警队驻所，现保存完好），由区干队长廖国凡背上许国华悄悄撤退，把许隐藏到一农民家中，并给他用土法包扎了伤口。十二日晚东禅区长贺枝贵接到拦江电话报告敌情后一直失去了拦江的消息，心里非常着急，估计凶多吉少。刚从拦江赶到东禅的罗年春，刘光寿分析拦江形势：“我们早就应该到区上报到，但一直有人跟踪，不敢妄动，现在拦江肯定打起来了。”贺枝贵立即命令“增援拦江”，于是贺枝贵、李栓堂指挥一个排（当时约 30 人）由罗年春、刘光寿带路跑步赶往拦江，早晨 6 点钟部队赶到离拦江南约 3 里的玉泉寺作了战斗编队，分两个战斗队摸进拦江，在场外与土匪交火，解放军战士犹如下山猛虎，利用地形地物猛打猛冲，那些乌合之众的九路军一接火，高叫“涨水了”拖起

“烧火棍”(长枪的俗称)就往河边方向逃窜。被蔡仁甫家锁着的易震东听到枪声,用枪托砸烂窗户跳出来加入队伍。街上的百姓听到激烈的枪声,估计是解放军打回来了,有人悄悄从门缝里往外偷看,认出罗年春,便开门向部队介绍情况,李栓堂带人到碉堡内找到坚持战斗

的工作队员,又在农民家里找到许国华。部队在追剿九路军时,在聂家丫口路边发现一个五花大绑浑身鲜血的人,罗年春将那人翻过身来看,那人大叫“我是工作队员唐明武”,罗见真的是唐明武,便马上给他松绑。原来,九路军在碧云宫抓到来不及撤离的唐明武,把他五花大绑吊在小桥边的黄桷树上,由夏中孚亲自拷问罗年春的下落,但唐至死不说真话。后来解放军冲来,九路军押着唐明武逃跑,企图以他作人质,由于唐明武被吊打半夜,筋疲力尽无法跟上九路军的速度,九路军刘大眉毛正要向唐明武开“锁喉枪”时,唐觉身后有异便回头向后看,子弹从唐明武的颈部穿过,才未致命。天亮时,解放军在场镇活捉“反共救国军”营长夏中孚及三个九路军分子,并发现被九路军枪杀的留用旧镇公所干事

谭云光(乐至县人,死时 20 岁),解放军掩埋了他的遗体,并举行了简单的追悼仪式,(后来家属领回尸体重葬,并按政策发放了抚恤金)。午饭后,贺枝贵、李栓堂等研究,为防土匪乘虚偷袭东禅区政府,便以一个班的解放军留驻拦江,其余人员抬着许国华、唐明武,押着夏中孚等其它俘虏撤回东禅。

23 日晚,罗年春,易震东等冲散后归队的工作队员同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坚守在寨子坡。易震东用重新安上的电话与东禅通话时发现被九路军抢去的电话又在另一个地方接在了拦江与东禅的线路上,情况十分不妙,又听到拦江场外有零星的枪声,寨子坡西面脚下的白安河里似乎有人在划船的声音,罗年春命令易震东等没有作战经验的人把子弹全部交给解放军战士在手榴弹上绑上生石灰包,以增加威力,就是炸不死敌人也叫敌人睁不开眼睛,他自己则守在寨门边。约 12 点,罗发现一个身穿长衫腰系白毛巾的人影以坟包作掩护,鬼鬼祟祟地向寨门靠近,罗等那人靠近寨门要上石梯时向其开火,那人就地滚进沟里逃脱(后来查明是拦江破石垭的大烟鬼,专门替人打官司的“刀笔匠”王 XX)为诱敌集聚,以利围歼,24 日凌晨两点,罗年春接到县里通知,队伍暂时撤到分水。

败退三合寨

2月24日,以罗静轩为首的九路军得知解放军撤离后,又耀武扬威回到拦江,并向百姓训话:“你们看到没有,九路军凶还是八路军凶?他们到拦江来梭一下就遭我们赫起跑了,八和九哪个多?你们算不清帐嗦?听清楚!今天老子要血洗拦江河!拦江永远是刘、罗、王的天下!”九路军在莲溪寺(粮站)外借口打死一个姓熊的赶场农民示众:“看、看、看,这就是替共产党办事的下场!”中午又在靖天宫隔壁的茶馆枪杀曾经为工作队提供缴枪线索的白马场祠堂坝人谭××(后来按规定发放了抚恤金)。这些消息也很快传到了分水、东禅和遂宁县。在东禅审讯活捉的九路军时,查明除夏中孚外,其余三人系罗静轩等人胁迫加入,还没有犯下大罪,为了瓦解敌人,经教育后释放回家,贪生怕死的夏中孚在审讯时跪地求饶,并保证“只要饶我不死,我一定能说服罗静轩他们投降,决不与共产党为敌”。上级指示,“夏中孚若能立功,可从宽处理,若在战斗中对我不利时可就地处决”。县、区知道拦江的情况后,增派个排的兵力,补充了武器弹药,于25日深夜11点钟押着夏中孚从分水出发向拦江开进。当时天寒地冻,呵气成冰,许国

华吊着右手,走在队伍前面,易震东、喻玄华、舒会同他们紧跑

慢跑才能跟上队伍,一路急行军,于26日早上4点多钟到达离拦江场约5华里的曾家丫口稍事休息,并作好战前编组,为了迷惑敌人,称许国华为连长,称罗年春为指导员,一是给敌人造成有一个连队的兵力的假象,二是不给敌人认识罗年春许国华的机会。根据拦江的地形,许国华将部队分成三组从不同方向,同时攻进拦江,许国华、廖国凡、易震东、郑玉泉、舒会同及部份解放军攻中路,罗年春、唐觉先,喻玄华,王超然(现宝石10村人)及部份解放军攻右路,其余的解放军由李排长(河北人)率领由工作队员陈德带路攻左路,三路人马静悄悄向拦江场镇摸去,天微明时与敌人交火,夏中孚听到枪声一响,就一边高叫,“我是夏中孚!”一边拼命逃跑,许国华用左手甩手一枪将其击毙。战斗打响后,枪声密集,子弹划破长空,附近的家犬狂吠不止,工作队员们也紧紧跟随解放军战士奋勇向前,乘胜追击,在大码头(现被麻子滩水淹,位置在现莲花酒厂东面的河里)三路人马会合后又奋力追杀。九路军经袁家垭口(现拦江九大队与真武一大队交界处)窜至三合寨(拦江九村)据险顽抗,解放军从四处寻掩护点,向寨内发起射击,见于三合寨位置最高,

易守难攻,解放军组织多次冲锋未果,故决定暂时撤回拦江,再作准备以利全歼顽匪。在追击中活捉一个九路军分子,由两个工作队员押回,当走到大码口下边的石场

附近时,那人挣脱了绳索,纵身跳进河里企图游水过河逃命,此时队伍中的喊声和枪声同时响起,河水立即被染红一片,解放军把尸体捞上岸(被其家属收尸)。后来解放军在场镇周围搜查时,发现一副棺材轻微地抖动,并有水从里面流出,估计有“鬼”,向棺材连开两枪,揭开棺材盖一看,个九路军分子抱着小马枪被打死在里面,原来是九路军头目罗静轩的通讯员黎天金因逃跑不急躲在棺材里。在这次战斗中,据传说解放军李排长在攻三合寨时,军帽被敌人的子弹打掉,险些被打中,后来老百姓知道这件事后说解放军是为穷人打坏人的,“有菩萨保佑”。

战斗结束,拦江场镇居民,生意人开门迎接解放军,乡下的老百姓也上街来看“神兵”,场镇热闹非凡。罗年春、许国华等趁机召开大会,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揭露暗藏的九路军,及其罪恶阴谋,同时清查、清洗了内部不可靠人员。经过一系列工作,提高了群众的觉悟,纯洁了革命队伍。工作队驻守寨子坡随时监视敌人,准备再次集中力量,聚歼残匪。

真武山美梦

龟缩在三合寨的九路军,自知虽凭山高坡陡,据险以守,暂时未被消灭,但无房无水给养困难,加之距工作队和解放军驻地拦江场镇很近实难久守,便连夜逃窜,分散隐藏。二十七日夜,雷一鸣,谭果维又与罗静轩秘密策划,谎称:“雷已经同所谓的把兄弟取得联系,他们叫我们马上行动,争取给全国做个榜样,蒋委员长自会论功行赏,我还联络了中江县、安岳县、蓬溪县、乐至县的人马,只要拦江这边组织好了,他们马上就到。”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罗静轩等人听后精神为之一振,马上召集首领开会,决定以罗静轩当舵把子的哥老会双合官堂口真武山为大本营,成立九路军总部,罗静轩任总司令,谭果维任参谋长兼三纵队队长还兼军医,罗旭初任二纵队队长,雷一鸣任副司令兼一纵队队长。中江、安岳、蓬溪、乐至各路人马也化妆成走亲戚,做生意等三三两两陆续到达。农历2月29日,罗静轩带着他的烂杆杆队伍,鬼鬼祟祟地溜上真武山。

真武山在拦江西北,距拦江约 20 华里,雄居群山之首,地势险要,山上古柏参天,百鸟栖息,建于唐朝的真武庙,庙宇雄伟,金壁辉煌,寺内庙产丰厚,香火旺盛,罗静轩的哥老会在此设堂口时又修筑了部份防御工事,只留东西两个小寨门(寨墙内面积约有 30 亩),罗静轩以为选中这么一个易守难攻,又有神灵佑护的好地方,定能成就“大事”。

九路军驻进真武山后,立即向附近各保硬派任务,限两天内向总司令部各送肥猪一头,大柴十担,大米十石,银元 100 元,保长许白福(现真武村人)表示有困难,九路军威胁说“不按时交齐,全家死完”,当晚,九路军还抢了地主高白福(现真武二村人)家的肥猪一头,老酒一坛,大米若干。半夜里,总司令与手下的部队一起猜拳行令,山吃海喝。身穿长衫,尖嘴猴腮的参谋长谭果维举起酒碗:“弟兄们!跟罗司令当九路军,喝不完的酒,吃不完的肉,跟共产党只有吃草根,啃皮带,只要跟着罗司令好好干,蒋委员长不会丢下你们,到那时,我们天天过年,想不尽的荣华富贵,干杯”,众匪也高呼“干杯”。农历 3 月初一,各保派去给九路军送菜,送粮的农民被关在山上,强迫加入九路军,不跟着干就要“满门抄斩”。庙里的和尚和山下的群众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却又敢怒不敢言,九路军成天在山上逍遥自在。

农历三月初二早上,总司令罗静轩等在山上检阅他的队伍,再次向他们训话,许以高官厚禄,过后带着谭果维、雷一鸣等摆着一副军事家的派头指指点点在寨墙上察看地形,准备顽抗到底。

仓皇大逃离

被“胜利”冲昏了头的罗静轩还沉浸在做“县太爷”的黄粱美梦之中,有一定军事常识的谭果维却感到了不安。早上他们“阅兵”后在寨墙上察看地形时,发现真武山乃一座孤山,虽据

守容易进攻难,却毫无退路,正犯了兵家之大忌,但他闷在心里不敢说,怕影响了刚刚高涨的“士气”。庙里张和尚见九路军上山后的情形是要长驻下去,生怕耗尽庙产,毁坏庙舍,得罪神灵,整天忧心如焚,他经过再三思索,决定下山打听一下情况。三月初二早上,张和尚找到罗静轩说:“老总,帝主宫(现大英县河边镇粮站,

距真武山 8 华里)师公叫我去一下。”罗静轩同意后却被谭果维叫住：“在外头嘴巴莫多,小心脑壳搬家!”

下山后他见到了当地的保长和一些有影响的人,大家都吃尽了土匪的苦,决定想法吓一吓他们,看能否将其撵走。下午,张和尚回到庙里,谭果维问:“你师公叫你做啥子?”张和尚气鼓鼓地答:“晓不得有啥子事,连师公的面都没见到。”谭果维感到奇怪:“哪个呢?”和尚更是气冲冲地说:两个外省佬背起盒子炮守在帝主宫门口,不准我进门。”谭果维大惊失色:“他们穿啥子衣服?“两个外省佬穿一样的衣服。”他们有好多人?”

“不晓得,听人说中午阵煮了三挑米的干饭。”谭果维丢下张和尚跑去找罗静轩,雷一鸣等人,谈了自己早上察看地形时的顾虑,又告诉他们河边来了近 300 解放军,顿时,罗总司令慌了手脚,这时,又有人来报告说:“山下姜保长在动员群众打扫卫生,准备门板,挖了三口地灶,不晓得在搞啥子名堂。”谭果维,雷一鸣等顿感情况危急,这时东寨门口又传来叫骂声,一群烧香老太婆要上山烧香,被九路军哨兵拦住,老太太们周旋良久,便在哨兵面前烧钱化纸,咒骂哨兵不得好死,断子绝孙瞎眼蹩脚,有个大胆的老太婆还拣起石头向哨兵丢去。九路军便在慌乱中决定放弃真武山,逃往洛阳桥。真武山西寨门大开三自余乌合之众蜂涌而出,于是查家弯(现真武 3 村 6 社)二灶匠家被洗劫一空,白石嘴,骑龙店,接绍寺(俗称鸡叫寺,吉照寺)长坡等地的群众便见了三人一群,五人一伙的“生意人”,“走人户”,“游山玩水”的人。有的抱

一床棉被,有的提一腿猪肉,有的扛一个麻布口袋,雷一鸣则由两个九路军用滑杆抬着,身后跟着几个背枪的九路军做“跟班”,他们化整为零迂回逃离。迷惑百姓,让人不知他们的落脚点。

遂宁和乐至两县交界的洛阳桥(现被新生水库淹没)附近,山高,林密,沟深,路险,既能躲藏又便于逃跑,洛阳桥下的河沟在长坡咀是两河口。长坡象一只龙的爪子,将河分出三个盆来,洛阳桥就在这三个盆的中间,桥上半坡有个千佛岩,庙内有5个和尚,罗静轩就驻在庙里,千佛岩下是盐局的食盐收购批发点,盐局傍边是地主谢家宅院,因房上有雕花装饰,人称“谢家花房子”九路军大队人马便驻在盐局和“花房子”还有一部份走到接绍寺便不愿再走,驻在寺里。刚睡不久,老鼠寻食打破一只碗,“咣”声响,九路军惊得抱头鼠窜,得知是一场虚惊后,亦认为打烂碗不吉利,也连夜搬家到“谢家花房子”。

“河边场来了三个连的解放军”,“解放军要攻真武山”这是谭果维根据张和尚的谈话中得出的结论。张和尚等人用此办法,也确实达到了把九路军赶出真武山的目的。应其实,九路军的一切行动,都在解放军的掌握之中。雷一鸣,谭果维来拦江、罗静轩驻扎真武山等具体情况都及时汇报至东禅区、遂宁县。上级领导研究,决不让九路军形成气候,要尽早彻底消灭。验下的,出三月三,是真武山每年的庙会。庙会期间,要唱大戏三天善男信女如潮水般涌来,许多小商小贩也云集于此,是一年中最为热闹的时候。九路军在真武山安营扎寨后,这一切都成了泡影,解放军利用这一大好机会,动员一些老太婆提前去烧香,侦察员便化妆成烧香人混在里面,把山上的情况探得一清二楚,又根据九路军喜欢在寺庙驻扎的特点(因为人多,也只有寺庙才能安扎),在各个寺庙都放有眼线,一有情况,拦江,东禅,遂宁马上就会得到报告。

激战洛阳桥些得知九路军撤出真武山,逃至洛阳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独二团的两个连配备精良武器一路跑步来到拦江,配合征粮工作队,分三路向千佛岩开进。一路经石板路(现在拦江到真

武的公路)直取千佛岩,一路经鹅项井(真武双福寺村),水桶弯(现马河十村)直取千佛岩。黑漆朝门(原真武乡一大队)的彭立光(又名彭永固,后任真武乡长,96年去世)家是以开面坊为生的,他家请周良前(凉风人,现健在)帮工,周良前睡在屋外的床上,三月初三凌晨3点钟左右听到嚓嚓的脚步声,抬头一看,见一大队人,吓得赶紧用棉絮捂住头。这路人马正是去洛阳桥攻打九路军

的解放军一个连,他们正在为找不到方向而发愁,深更半夜又找不到本地人,走在前面的解放军发现从床上抬起头的周良前,便去请他带路,但解放军全是外省人,讲的话周良前听不懂,讲话的声音惊醒了睡在屋里的彭立光,他披着棉衣出来一看也吓了一跳,但他听明了解放军让他带路到千佛岩打九路军,便答应了。解放军不让彭立光走最前面,怕出危险只要彭走在第三位置上指路就行了。走了一段后,一个解放军把彭立光拉住,弯腰帮彭立光把鞋子登好,原来彭立光的鞋子是穿的“趿巴鞋”,走在队伍中发出极不协调的“吧哒”声。走到骑龙店时,彭立光被两个解放军战士猛地按倒在地,彭立光大气都不敢出,稍等片刻,他悄悄一看,前后所有解放军通通爬在地下,紧握着枪,过了大约两分钟,他又被解放军拉起朝前走。

原来是在前面的解放军见路边有一株与人相似的柏树,以为

是遇到九路军哨兵,马上向后打出手势,立即卧倒出枪对准目标。象这样的情况发生过三、四次。队伍走到接绍寺时,遇到一个早起买猪的屠户肖贵才(真武六村人,98年去世),解放军问彭立光是否认识,彭一看,说认识,解放军问肖贵才接绍寺昨晚有人住没有,肖说有十几个人驻了一下,又搬到千佛岩去了。于是肖贵才又带路到长坡上。在长坡上碰到一个早起拣菌子的罗顺清(76年迁邛崃县,已去逝)问明情况后,解放军在长坡的两个分岔的坡上布置好兵力,(另一个坡由水桶弯开来的一个连控制),解放军叫彭立光、肖贵才、罗顺清赶快弯腰顺沟往回走。彭等三人走后不久便听到激烈的枪炮声。山头的机枪架好后,解放军尖兵班分三个战斗小组(每小组三人,使手枪)搜索前进。九路军哨兵罗年青(真武七村一社人)蹲在沙沟里便后站起时发现了解放军,首先一梭子子弹扫过来,打伤了一个尖兵的大腿,尖兵看到沙沟里站起一个人便迅速卧倒出枪,将罗打死。另一哨兵罗晏平也被另一个尖兵打死。听到枪声,九路军驻地大喊“水涨了”,“水涨了”乱成一团有的连裤子都没有穿就跑出去,九路军慌乱之后以为解放军

人数不多,便静观其变。雷一鸣指挥匪徒用“土牛儿”(自制土

炮)对解放军轰,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紧接着是呼啸着的锅铁碎片铺天盖地般向解放军袭来,好在无人受伤,解放军立即架起小炮向谢家花房子发射一枚炮弹,

轰的一声,炮弹在谢家花房子天井爆炸,九路军象被捅了蜂巢的马蜂一样拼命逃窜,解放军看着一群群服装不一又没带枪的人乱跑,不知哪是九路军哪是群众,指挥员命令:对“没带枪的,不开枪的不要打”,帮乌合之众沿着小河向乐至县矮子桥、石脚盆方向逃跑。

后来,有的九路军分子边跑边向解放军开枪射击,立即被密集的子弹打死,有一个九路军躲在陈安居的猪粪坑里,被陈安居

老婆发现用竹竿一捅,那个九路军拖起枪就跑,在半山上被解放军发现击毙。战斗结束后,解放军将寺庙,附近农户,红苕窖等凡能藏身的地方进行了仔细搜查清理战场,共打死九路军60人,活捉130人,其余匪众或潜逃回家,或潜至亲友家中躲藏。遗憾的是九路军的头目罗静轩、雷一鸣等人逃脱。受伤的解放军战士由赵九江(真武6村人,当时是东禅区农协第17分会千佛岩武装部武装委员。后任真武乡长,已退休,现健在)和另一人抬回拦江。自称神枪手的国民党兵痞蔡云,也因向解放军开枪而被乱枪打死,两天后,他老婆在死人堆里找到尸体,背到真武山4村2社埋葬。

九路军覆灭程

洛阳桥激战结束后,遂宁县指示;由杨俊、罗年春、刘安治

在拦江组成法庭,审判被捉土匪,以“镇压与宽大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为原则,经过认真调查取证,对胁从的大部分人教育后让其悔过自新,回家老老实实过日子,对罪过较大的10人送遂宁关押审判,12人送乐至县处理,10人送安岳县处理:剿灭九路军后,遂宁县府决定将原第三区改为第六区,并将原三区所辖的拦江、新生、莲花、宝石和中心乡新成立第七区人民政府(拦江区),由李栓堂任区长,罗年春任副区长,经过继续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一些在逃的受骗参加九路军的胁从人员,在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纷纷自首,悔过自新。工作队教育先自首的九路军骨干分子余杰,设法劝说了罗静轩,罗旭初等匪首回来投案,并交回三支手枪。但罗等投案自首后仍贼心不死,继续与雷、谭等密谋造反,实属罪大恶极。1950年秋遂宁县组成拦江等临时人民法庭,分别依法判处雷一鸣、罗静轩、罗旭初、谭果维等犯死刑,就地枪决。后来在清匪反霸和土

地改革运动中,又根据群众检举揭发的事实,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之规定,报经上级批准,由人民法庭对 30 余名积极为九路军提供枪、弹、费用和人员的恶霸地主,以及罪恶很大教育不改的九路军骨干分子,分别在各乡公判死刑或徒刑,拦江九路军及其残余势力被彻底消灭。共产党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无限爱戴和信任。广大群众积极响应号召,踊跃送交爱国公粮,不仅完成了一九四九年欠粮,还提前完成了一九五〇年的公粮任务,取得解放后拦江第一个全县第一名,第一次受到了遂宁县政府《全县第一、全区之光》的锦旗嘉奖!

清代乡村民众教育的典范

一记中国西部遂宁龙翔书院

刘耀空

台湾学者 目光投向龙翔书院

杨廷佐老师,高中语文教员,先后执教于绵阳中学和遂宁中学,已退休十来年。几年前因给船山政协采编“教育专辑”,我与杨老师共事,从此交往甚密。杨老师就读于兰州大学中文系 1956 级,昔日学友时有交往。2008 年他曾去北京跟同窗聚会。回到遂宁后,他向我谈到魏丕一先生。魏先生原任四川大学副校长,明清文学专家,退休后侨居加拿大,现任多伦多孔子学院院长。魏先生是杨老师的学友,去北京前先取道台湾跟同仁会晤。近年来台湾学术界掀起一股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热潮,与他相会的人是专门研究明清时期书院的专家,他们确认那时有代表性的书院,东部是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中部是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西部是四川遂宁的龙翔书院。就东林书院和岳麓书院而言,他们有较为完备的资料,而对龙翔书院却知之甚少。他们对龙翔书院很感兴趣,知道魏先生在四川工作过多年,希望他能助一臂之力。于是魏先生在北京跟杨老师交谈时,拜托杨老师打听一下有关龙翔书院的情况。几年前共事期间,我曾向杨老师谈及搜集龙翔书院资料的情况,所以我们在 2010 年上年相见时,他直截了当对我谈了魏先生委托他办的事。其实几年前我就在《船山文史资料》上介绍了龙翔书院的情况,只是

文章字数较少，介绍的情况很简略。为了让台湾学术界的专家较全面地掌握龙翔书院的第一手资料，再现龙翔书院当年的丰采，展示遂宁厚重的文化底蕴，建设遂宁美好的未来，我又打开尘封的资料，走进耕耘过的土地，沿着历史的足迹，重新写了这篇文章。

张问彤 一个被埋没的遂宁才子

提到龙翔书院，就得从它的宗师张问彤说起。

张问彤，字受之，一字锡功，号饮杜，张鹏翻的胞弟张鹏翼之玄孙。1689年，张鹏翼受朝廷派遣，以武官的身份护卫包括以张鹏翻为副使的外交使团，出使俄罗斯，圆满地完成了签订《中俄尼布楚边界条约》的使命，使我国沿俄罗斯的边境安定了200年左右。清王朝授予张鹏翼“定远将军”的官衔以示嘉奖。张鹏翼的后代集中居住在遂宁北坝至新桥镇一带，直到现代，张姓人士与别人交谈时，总是把“我是定远将军的后代”作为口头禅，以祖宗的光荣历史而自豪。

张问彤生于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5月13日，从小聪慧好学，才智出众，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考取拔贡，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获四川乡试解元，1796年（嘉庆元年）举孝廉方正，补什邡教谕（元明清县学教官，掌文庙祭祀，训诲所属生员），晚些时候授山西省和顺县知县。山西巡抚欲留其在省垣以备顾问，拟以知州将其升用，未果。病卒于1832年（道光十二年）6月1日，葬于遂宁市船山区新桥镇四村的象山。

清人李星根曾为张问彤作《受之先生传》，谓张问彤“博学多才，好为古文字，兼冥心理学”，并与人讨论“声音文字之学”，即现代的汉语拼音。他是我国研究汉语拼音方案的先行者，我们现在采用的汉语拼音方案是经过包括张问彤在内的许多语言工作者辛勤工作的结果，他们为汉字的注音和拼写、为汉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张问彤研究“声音文字之学”，也为教育事业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张问彤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见长于诗歌。张氏家庭是古今中外人数最多、绵延时间最长的诗人世家，先后涌现出了几十位男女诗人，这不能不说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给遂宁的文化宝典增添了光彩四射的一页。张问彤父子都是富有才气的诗人，张问彤今存诗200余首，“佳句如‘春静人来少，庭闲鸟下双’、‘地寒晴养麦，天暖雨肥雨’、‘偶因沽酒知鱼价，恰为锄花破藓斑’、‘梦里还家兵世

界，病中愁日闰干支’、‘心肝不死忧家国，诗句无灵愧弟兄’俱新雅”。（见孙桐生《国朝全蜀诗钞》卷三十三）。张问彤现有《饮杜诗集》和《饮杜文集》存流于世，泸州进士王检称其诗“谨严”、“醇雅”、“不愧古作者”，可见时人对其评价之高。《遂宁县志》对他的长子张知简（监生、解元）有“天资敏捷，学问渊深，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记载。《巴蜀文化大典》中有“遂宁三张”的辞条：“清代遂宁诗人张问安、张问陶兄弟与从弟张问彤三人的合称。”张问陶是“遂宁三张”之首，系清代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张鹏翻的玄孙。张鹏翻历代为宦，均有政声。张问陶学识渊博，27岁举进士，后出任山东莱州知府。一生致力于诗、书、画，造诣颇深，诗名满天下，被誉为“蜀中诗人之冠”。今有《船山诗草》二十卷（存诗2270首）见诸于世。问陶比问彤长四岁，两人情谊深厚，互相时有唱酬及书信来往，切磋诗歌创作的见解。

张问彤才华横溢，但时乖运蹇。清代学者孙桐生感慨地说：“受之少负隼才，举乡试第一，士论推重。七上春闱不第，以荐孝廉方正，得官广文，未展其才，人颇惜之。”（见《国朝全蜀诗钞》卷三十三）。“心肝不死忧家国”是张问彤诗中的珠玑，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可是在黑暗的封建制度下，哪怕才高八斗，满腹经纶，也会遭到排斥和冷落，就像璀璨的珍珠被泥土埋没一样，失去了闪光的机会。

命途多舛没有使张问彤感到迷茫，在他四十多岁时，把自己的全部心血洒向了龙翔书院，在乡村民众教育中显示了自己高贵的人生价值。

举办“乡学” 独辟乡村民众教育的蹊径

书院是亚洲东部地区古代教育制度有别于官学（国家办教育）的一种教育系统。我国唐宋至明清出现了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公元635年（唐贞观九年）张九宗在遂宁县开设的私人书院（九宗书院）是我国最早的书院，比湖南的岳麓书院（始建于五代后周）早办了300多年。

785年（唐德宗贞元年间），遂宁由刺史乔琳创建于县城南的县学（官学），毁于五代孟知祥之乱；1044年（宋庆历四年）太守廖询将县学（又称学宫）迁建于城东，后被涪江水冲圮；1202年（南宋嘉泰二年）太守赵善宣再度将学宫迁至书台山下（九宗书院旧址）。“三迁而至今，长此不移”（明席书语），此后元、

明、清三代学宫均在书台山东麓。学宫以淳化风俗、培养人才为宗旨。生源在全县范围内以考试选取，被取学生由官府供给生活，日夜苦读《四书》、《五经》，研习八股文，以金榜题名为奋斗目标。学宫是造就官吏的机构，学生享受国家的津贴，这样的县学处在教育金字塔的顶端。

在明代嘉靖年间，知县郑重威和被贬家居的杨名在城中百福寺创立了武信书院，此后三迁其址（1722年[清康熙六十一年]迁于县署西边，1747年[乾隆十二年]迁于文昌宫[城中小南街]，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再迁于书台山），最后定名为“书台书院”。从初建至清末，书台书院有近400年的历史，它对人才的培养起到了示范和领军的作用，在遂宁富有极高的声望。“吾邑惟书台之麓，自昔开都讲之堂、、、、、方今人才济济，文治蒸蒸。”（张问彤：《建修旗山书院碑记》）书台书院也是官办的学校，设在县衙所在的城市，学生虽然不享受优厚的待遇，没有获取功名的特殊途径，可是普通百姓却不可向迩。

明清之际，还有民间（含城镇和乡村）集资兴办的书院、书屋多所。如梵云山书院，初建于1519年（明正德十四年），系章讲（乡试解元、后任兴平县令）讲学之所，此后数百年间，墨客骚人云集于此，成了遂宁的文化胜地；灵泉寺侧的梅山书屋从1504年（明孝宗弘治十七年）起为席象与詹祖周、文桂、陈硕、张漩等才子的读书之处，后来席象中进士，拜户科给事中。梅山书院在遂宁很有名气，登临灵泉山寺者多赋诗咏之；杨名于1528年殿试高中探花，授翰林院编修，1532年（明嘉靖十一年）因上书言政事遭罪，翌年获释还乡，从1533年起在横山乡蟠龙山讲学凡20多年，学校名“方洲书屋”，在遂宁学术界颇有影响力。以上所列的书院、书屋，既具有教育的性质，又有学术的特点，学校的主讲（或学生）都是高层人士，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那些学校有一道无形的高墙，平头百姓被拒之门外。

真正具有民众教育鲜明特色的学校，是张问彤于1814年创办的龙翔书院。以往教育界的人士囿于传统的教育观念，墨守成规，不敢越雷池一步，使教育阵地像一潭死水毫无生机。而张问彤有真知灼见，敢于冲破旧的办学模式，进行教育创新，具有超凡脱俗的胆识和勇气。他把书院办在偏僻的乡村，让那里的农家子弟有了读书的机会。这是官办教育根本办不到的事情，张问彤却用他的“乡学”对官办教育（国学）所缺失的功能作了补充、延伸。在张问彤的引领下，桂花的

桂香书院（1818年）、大安的仁和书院（1821年）、永兴的旗山书院（1829年）、观音的玉堂书院（1854年）、龙坪的德阳书院（1874年）等先后建立了起来，至清末遂宁乡村有16所书院。

龙翔书院位于安居区横山镇龙翔村卧牛坡山麓。相传在古代，卧龙坡周围出了三个进士，是个藏龙卧虎的胜地。三个进士中黄进士最出名，他在卧牛坡下建造了一座豪华的府宅，另外两名进士常来此处聚会，因此黄府便有了一个别名——三学会。这是传说，未必可信，不过黄氏府宅确有文字依据，张问彤在《创建龙翔书院碑记》中写道：“其间贤父兄虑子弟之失其教也，而买黄氏之居，创为书院；复买其田60余亩，以为延师之需”。1814年（嘉庆十九年），张问彤前往此处办学，受到了乡民们的热忱欢迎。“余之始至，每以风雨穿窬为虑，既而补苴罅漏”。（张问彤语），校舍简陋，不避风雨，当时的办学条件极差。乡人银理斋弟兄及郑书、王景运、吴东望等十人解囊捐资修缮、扩建学校，并长期为书院的施工尽心尽力，“始终十年之间未尝推诿、懈怠。用观有成，则理斋之力也。”（张问彤语）历十年工夫（1814—1824），一所乡村书院终于建成。校园设计精良，布局合理，建筑错落有致，教室高大宽敞，窗明几净，设施一应俱全。校内栽树种草，环境优美。校园以石墙合围，坚固安全。“耳目清而无市井之习”（张问彤语），真是教书育人的好处所。张问彤经过深思熟虑，把这所学校取名为“龙翔书院”。

张问彤为何把书院以“龙翔”命名，在《创建龙翔书院碑记》上有这样的记载：“邑西五十里，有山曰‘龙头’……其地发脉龙头，因目为‘龙翔书院’。”龙头山（又名双龙山）系该地最高峰，山奇形胜，富有灵气，卧牛坡发脉于斯，书院名曰“龙翔”，蕴含奔腾向上的寓意。在书院校门两旁朱红色的墉壁上面，各有一条活灵活现的巨龙，两个龙头高高抬起，展现出腾空欲飞的雄姿。张问彤要在这里辛勤耕耘，让黯淡的人生发出耀人眼目的光彩。

龙翔书院 张问彤崭露头角的舞台

张问彤生活在清王朝从中期到后期的过渡阶段，中国社会由中兴走向衰微。在文化方面，康熙大兴“文字狱”，严重地阻碍了文化的发展，乾隆以来，“文字狱”有所放松，文化教育才逐步得到一定的复苏。张问彤有一颗报效国家、民族的拳拳之心，满腔热忱地从事民众教育事业。在《创建龙翔书院碑记》中，他阐

明了对教育的意义和作用的想法。他写道：“其切于人而效之远也。”强调了教育的迫切性和教育的社会效益；“其材之成，则天下有所赖；而其不成，亦不失为醇谨寡过之士，而于人心风俗无所败坏也。”学校的作用是既要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又要塑造他们的灵魂（思想、道德、情操等），实现两者的统一。这段话从两个方面讲了学生受教育的结果：学业有成，则学生有所作为，对社会有贡献，也包括思想素质“有成”；学业无成，学生也能成为一个有良好思想品德的人。张问彤在近 200 年前的这个教育观点，跟现代的教育思想是完全合拍的。

当时社会上有两种办学形式：一种是“国学”，由政府办教育，经费由政府拨发，教师由政府委派，学校设在县城；一种是“乡学”，由群众办教育，资金由群众筹集，教师由群众聘请，学校设在乡村。张问彤热情地赞扬了“乡学”：“乡学之成就人才者，不异于国（学）也。”他指出了“乡学”的许多长处，而最根本的优点在于“其事乡人主之，官司不与也。”民众掌握了办学的自主权，就能充分调动办学的积极性，这是办好教育的首要条件。需要说明的是，当时中国是个封闭的封建国家，统治阶级没有把发展国计民生（包括教育）当回事，而社会生产力相当低下，经济基础十分薄弱，无力把教育办到广大农村去。民众有企盼子弟入学、渴望子弟获得知识的办学热情，他们以“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方式解决了办学资金，开辟了兴办农村教育的宽广道路，办成了政府不能办成的事情。

教育的关键在教师。当时的师资状况令人堪忧，而“国学”始终不能解决求师的弊端。张问彤剖析了当时教师的现状：名师“不可多得”，况且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以资历、声望自居，讲求经济待遇；一些“不以训诲为贤”、“不以学行为重”的人则通过地方官吏把他们推荐出去教书；还有一些人自我标榜，力图插足于教育阵地，等等。所以，“务传道、授业、解惑者，盖无几矣。”与之相反，“乡学”却堵塞了上述的求师渠道。“为之师者，必其乡人之所信服也。”群众“慧眼识英雄”，教师素质的高低优劣他们自有评判。教师得到民众的信赖，必将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做好教育教学工作。教师选好了，学校的其他问题就不难解决了。张问彤亲自主持教师的遴选工作，通过严格的考察把学识渊博、品德高尚、责任心强、群众信任的举人、秀才一类的人才延聘为师。张问彤离开书院以后，历届主持教学的人均坚持了他遴选和管理教师的原则，并一以贯之。这是龙翔书

院长盛不衰、越办越好的根本所在。

张问彤文才超群，深孚众望，在遂宁威信极高，他到龙翔书院时，方圆几十里的学子蜂涌而来，甚至相邻几县的少年也慕名而至，其中今大英的名门后生较多。日后班级愈办愈多，龙翔书院的名声大振，成了闻名避迹的一所名校，在教育界备受推重。

学院有相当严格的管理制度，校训、校规书于高墙昭示学生，教育秩序井然，勤奋好学蔚然成风。教师仪表端庄，言谈举止高雅，教学认真负责，堪为学生楷模。张问彤按照科举制度的要求，让学生习读四书、五经，传授“三物”（自然常识）“六行”（待人处事的品行），“古先圣王之道，国家当世之法，淑身善事之宜无不备也。”（张问彤语。这一部分的引文，均出自《创建龙翔书院碑记》）在教学内容上墨守古人成规，那是时代条件所致，他无法跳出历史的圈子，越过雷池的限制，我们不能苛求他。课程的设置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末。在此之前，书院没有文字资料可考，那时书院的运行情况无从知晓，但从张问彤“日孳孳以讲学为事”（李星根语）的记载，以及大成（孔子）殿中刻满取得功名学子姓名的六块功名碑，便可推断那时从严治理学校、一丝不苟教学、教育业绩显著的情况。在新旧交替的过渡阶段，采用新旧课程兼设的办法。民国以来，书院改为县立第八小学，这时距书院创立已有 100 年左右，教师们秉承了宗师张问彤赤诚敬业的风范，书院如日中天，成为辉煌的巅峰时期。学校开设国文（语文）、算术（数学）、英文（英语）、社会、地理、历史、自然、卫生、体育、音乐、美术（图画）、习字、手工等学科。与传统教育最明显的突破是高小阶段开设了简易英语，给学生打开了一扇世界知识之窗，让他们去窥视无比广阔的大千世界。这个期间书院的教学颇具特色；在国文（语文）课中非常注重读、写、说、作的基础教学，加强朗读背诵、汉字书写、说话训练和作文训练。“读、写、说、作”是一个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不能偏废，缺一不可。那时龙翔书院的语文教学遵循了这一原则，把教学工作切实地做到了家。接受笔者拜访的人士都热情地介绍了当年的语文教学情况。这里以说话训练为例。书院从一年级开始就开设了说话课，每周 2 节，不允许减少课时或被其他学科占用。教师先给学生示范，提高学生的兴趣，指导学生进行说话实践。每个学生必须走上讲台说话，教师对学生的说话要进行评议，并记下所得的分数。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逐步扩大说

话的范围和内容。到了高年级，配合课文和作文，教师要提出专门的话题，让学生通过观察、分析、思考然后进行讲述并作文，提高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学校还开展了答辩训练的尝试，组织思维活跃、应变能力强的学生，以树立志向、爱国强国等议题为中心，阐释观点，进行争论。据说“九一八”事变后，学生们就当时国家危亡的局势展开了大讨论，不少学生慷慨激昂，热血沸腾，写出了很多痛斥日本侵略者狼子野心、呼吁国人誓死保卫祖国河山的作文，师生们同仇敌忾，爱国热情不断高涨。说话训练推动了整个语文教学，激活了语文教学的各个方面和环节，不仅形成了有机的知识、技能链条，而且推动了学生思维活动的发展，促进了学生思想品质的提高。书院长期坚持举办演讲会、书法展览和作文比赛。在书院毕业的很多学生不但品学兼优，而且工于书法、善于言谈、长于写作，得到了全面发展，其中的佼佼者当推聂敏藩、税国祯、税淑均、龚建侯等人。聂敏藩读书过目不忘，聪明过人，口若悬河，应变自如，超群出众的才干令世人惊叹。这样优异的学子不乏其人。学校的课外活动富有成效，教师定期组织学生“游学”（相当于现在的参观、访问、春游等活动），拓展了学生的视野，提供了学生观察大自然、接触社会的机会；“游学”与语文教学有机结合，活动过程中教师有适当的指导，回校后有针对性地进行说话训练或作文训练。学校还注重体育教学，广泛开展体育活动，定期召开运动会。校内有一个4000多平方米的运动场，是学生课堂外的快乐天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学生就开始踢足球了。他们虽然深居山野，可是这里的体育硬件设施能与城市比肩。书院在语文教学等方面旨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成功实践，很值得现在的中小学借鉴。

1937年，遂宁县教育行政部门按照调整学校布局的决定，将龙翔书院的教师和教学设施调到横山场镇禹王宫，与乡小学合并。至此，龙翔书院遂与横山乡小学融为一体，也就是说横山乡小学是龙翔书院的延续。

宗师风范 引领书院一路凯歌

从1814年龙翔书院创建到新中国建立后的近200年中，该校培养出了众多的优秀学子，他们走出母校的大门又跨进高一级的学校学习，甚至远渡重洋到海外留学，实现了“鲤鱼跃龙门”的跳越。他们中一部分人进入了官场，一部分人作了军官，还有的在教育、医疗卫生、科学技术等领域大显身手，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国家和人民，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国家的繁荣富强作出了可贵的

贡献。笔者对书院的优秀学子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清代近 100 年获取功名进入仕途者的名字均镌刻在大成（孔子）殿内六块功名碑上，可惜那些石碑在解放后被毁（按：具体情形请看《附录》），令人叹惋；民国以来书院人才辈出，有的竟至灿若明星。这里，笔者将有代表性的人物作不完全的简要介绍。

一、军队（建国前后共 5 人）

税梯青（1890—1938），又名伯鲁，安居区横山镇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抗日战争中任国民军 22 集团军中将参谋长，参加台儿庄血战，面临军长王铭章及多位师、团官员相继牺牲的悲壮局面，税梯青把生死置之度外，坚守第一线沉着指挥战斗，最后 22 集团军只剩下官兵十多人，为保存部队编制，总指挥命令他们撤离火线。税梯青被任命为代理军长，后来 22 集团军奉命到湖北襄樊整训。1938 年 9 月 12 日税梯青病逝于四川成都，年仅 48 岁。

税维诚（1889—1977），又名税古，祖籍安居区横山镇鸡叫山村。先后在四川陆军学堂、北京陆军部宪兵学校毕业，曾任国民军第 20 军少将参谋长。在任军职中他亲历军阀混战，眼见民不聊生，本人又遭所在部队师长的谮害，乃佯病就医，于 1937 年去职还乡闲居。居家期间正值抗日救亡之际，1940 年与税国祯等人创办私立明耻中学，任董事长。建国后热爱中国共产党，积极为人民工作，历任县人大代表（第一届至第五届）、县政协副主席（第一届至第四届）和县人民政府副县长（1955 年至 1966 年）。

张国麟，又名智夫，安居区横山镇人。曾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成都分校少将处长，1949 年去台湾，历任“国大代表”，退休后侨居美国，现健在。

张树生，安居区横山镇人。曾任国民党中央警官训练团指导员，改革开放后曾任市中区政协委员。

聂兆洪，安居区横山镇人。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防化兵研究所所长。

二、政府部门（建国前后共 9 人）

聂敏藩，安居区横山镇人。曾任国民党张群部行营稽查处长、四川省行政院院长。

唐鉴明，安居区常理乡人。曾任国民党合川县知事兼征收局长。

田继先，安居区横山镇人。曾任国民党遂宁县监察委员。

余思奇，安居区横山镇人。曾任国民党遂宁县教育委员。

余立人，安居区横山镇人。曾任国务院三线建设办公室处长。

漆力，安居区横山镇人。曾任自贡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李贵生，安居区横山镇人。曾任中共盐边县委书记。

王运书，安居区横山镇人。曾任中共甘肃某森工局党委书记。

余永富，安居区横山镇人。建国后曾任云南省公安厅处长。

三、教育战线（建国前后共6人）

税淑均，安居区横山镇人。与邓小平同期留学法国，建国前曾任重庆大学教务长。

税国祯，安居区横山镇人。建国前曾任私立明耻中学校董、校长，建国后任遂宁中学教导主任（1950—1957）。

余鲤，安居区横山镇人。建国前曾任私立明耻中学校董、校长，建国后任盐亭中学教师。

余涛玉，安居区横山镇人。建国后曾任西南农业大学校长。

龚协，安居区横山镇人。建国后任大学教授。

龚士弘，安居区横山镇人。建国后任大学教授。

四、医疗卫生战线（建国后6人）

银顺德，安居区横山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骨科专家。

熊德佐，安居区横山镇人。第三军医大学脑外科专家。

王成章，安居区横山镇人。名中医。

王南谷，安居区横山镇人。名中医。

王临轩，安居区横山镇人。名中医。

唐成德，安居区横山镇人。名中医。

五、科技战线（建国前后共3人）

刘方平，安居区常理乡人。留日博士，建国前创办遂宁实验纱厂，建国后任重庆市611纱厂工艺工程师。

唐茂云，安居区横山镇人。建国后任四川省林业勘察设计院工程师。

严以富，安居区横山镇人。建国后任江苏省有线电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六、社会贤达（建国前1人）

张 鳌，安居区会龙镇人。系民国时遂宁县慈善协会负责人之一，著名的左腕书法家。

附录：有关龙翔书院的补充说明：

一、龙翔书院的历史沿革

1814 年（清嘉庆十九年），张问彤到龙翔书院主持教务。

1814 年—1824 年（嘉庆十九年至道光四年），乡人银理斋等捐资整修、扩建龙翔书院。

1916 年（民国五年），龙翔书院改为县立第八高级小学校。

1937 年（民国二十六年），龙翔书院迁至横山场镇禹王宫，与横山乡小学合并，两校融为一体，横山乡小学就是龙翔书院的延续。

1953 年，横山乡小学改为横山区中心小学。

1957 年，横山区中心小学试办两个初中班（一年后并入横山中学[常乐寺]）。

1967 年，横山区中心小学开办初中部（戴帽初中）。

1985 年，横山乡（镇）初级中学建校（单设初中，小学迁至鸡叫山村）。

二、龙翔书院校园简介

龙翔书院坐落于郁郁葱葱、钟灵毓秀的卧牛坡山麓，总面积约 7500 平方米，其中校园建筑面积约 3500 平方米，运动场约 4000 平方米。从校门进去，主体建筑共三层，每层递高 1 米。第一层为生活用房，中间是食堂，两旁是学生宿舍；第二层中间为办公室，两旁是教师宿舍；第三层中间为大成（孔子）殿；在第二层和第三层左右两侧及大成殿两旁是教室（共 8 间）。主体建筑呈轴对称形，校门直穿食堂（第一层）、办公室（第二层）和大成殿（第三层）的正中是轴对称形的中轴线。校园系中式近古建筑风格，木质结构。一般房屋宽 5 米、深 6 米、高 6 米，高大宽敞。墙壁为优质浅红木板，色调淡雅。房屋上部是雕梁画栋，斗拱飞檐，造型精美。普通屋顶盖灰色陶瓦，办公室屋顶为琉璃瓦，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房屋层层递加，错落有致，气势恢弘。校内栽花种草，绿树成荫，环境优美宜人。校园以石墙合围，坚固安全。

三、民国年间龙翔书院的校长、教师名单：

1、校长

余斐清（县督学） 张国麟（常理乡人，四川大学毕业）
余思奇（县教育局委员） 田汝君
张南轩 方 英
舒大鹏

2、教师（部分）

冯琢章（清末秀才） 龚建侯（清末秀才）
余斐清 余登品
余思奇 张国麟
余趾清（清末秀才） 张南轩
田汝君 冯紫来
潘鸿君 陈启钦

四、龙翔书院的建筑、设施和树木的损毁情况

1、20 世纪 30 年代，方英任校长，巧立名目，以修缮学校为由，将校内 8 棵高 20 米以上，胸围 5 米左右（三人合围）的古柏卖掉砍去。方英是毁败书院校产的第一人。

2、校门内有两棵直径 3 米多（七个学生牵手合围）的黄葛树，树高枝长叶茂，枝叶交错如盖，省内罕见，给书院平添了一道宏丽的景致，师生们把两棵巨树称为书院的“风水树”。1950 年刚解放，政府向乡镇分配军队柴草（含燃料和马草）任务，黄葛树部分枝丫被锯下作军队的燃料。1958 年至 1960 年，公共食堂缺燃料，两棵黄葛树被砍去。其余树木（含桂花、紫金、石榴、塔柏）也被一砍而光。

3、1952 年修横山区公所大礼堂（兼作会议厅），书院的部分房屋被拆掉。石壁、围墙的条石被运去修粮站。

4、1964 年维修横山区中心小学，书院的房屋被全部拆除。盖房的瓦片组织学生背到横山小学去，琉璃瓦不能用，堆在地上被人打成碎片。

5、大成（孔子）殿的雕像、木匾、石碑也在劫难逃：

（1）孔子石雕像被推倒，头部被砸掉，有人把其头部丢进水田里，身子由二村的农民抬到一个小庙里去，使孔子像身首异地。

（2）魁星木质雕像（平面），在土地改革时被工作队劈成碎片炖牛肉烧掉。

(3) 大成殿门楣上书有“圆桥观听”四个镏金大字的木匾，被横山区中心小学抬去改作了乒乓台。

(4) 六块 功名碑被一户翻身农民抬去修了猪圈粪坑。因为圈里的猪连死几次，那户农民一气之下把粪坑拆掉，用铁锤把功名碑打得稀烂。

五、关于调查龙翔书院情况的简要说明。

笔者在 10 年前拜访了龙翔书院的教师、学生、工人及附近农民共 60 多人，被拜访的人年龄最大的近 90 岁。其中唐用之老人提供的情况最多；熊寿春老人的父亲是书院的龀师，在校几十年，熊老是书院最知情的人，书院平面图是在他的回忆下绘制出来的；笔者还拜会了书院的教师陈启钦（当年 89 岁）、学生余鲤（当年 85 岁）。此后不久，几位老人相继仙逝。段泽然家住书院附近，为笔者的调查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谨向给予笔者帮助的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重访黄坟山

罗贤慧

黄坟山原名鸣钟山，是明代工部尚书黄珂的墓葬所在地。

民国本《遂宁县志》卷二记载：“工部尚书黄简肃墓，在土桥铺。”另据史志记载：“黄珂(1449—1522)，字鸣玉，明代遂宁西眉镇北六里黄安桥黄榜石人……葬遂宁土桥铺（今安居区聚贤乡）鸣钟山。”

可如今向当地人问起“鸣钟山”，听者无不是一脸茫然，倒是“黄坟山”的名字妇孺皆知——“山上有座坟，以前埋了一个姓黄的大官。那坟叫黄坟，山就叫黄坟山。这谁不知道啊！”并且一定要再三强调：“自古以来那里就叫黄坟山，可没听过什么鸣钟山。”那位“姓黄的大官”就是黄珂，“黄坟”就是黄珂的墓地。从黄珂下葬，山上建起“黄坟”的时候算起，迄今已是将近 500 年，可不是“自古以来”么？只不过这“古”，既非“上古”，也非“远古”，勉强算是一个“近古”而已。

安居历史上的名人不多，黄珂算是其中一个。

《明史》（卷 185）中有对他的记载：“黄珂，字鸣玉，遂宁人。成化二十年进士。授龙阳知县。治行闻，擢御史，出按贵州。金达长官何轮谋不轨，计擒之，改设流官。贼妇米鲁乱，奏劾巡抚钱钺、总兵官焦俊等，皆得罪。改按畿辅，历山西按察使。正德四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安化王寘鐸反，传檄四方，用讨刘瑾为名。他镇畏瑾，不敢以闻。珂封上其檄，因陈便宜八事，而急令副总兵侯勋、参将时源分兵扼河东，贼遂不敢出。亦不刺寇边，珂偕总兵官马昂督军战，败之木瓜山。六年复寇边，珂檄副总兵王勋等七将分据要害夹击，复败之。屡赐玺书，银币。是年秋，入为户部右侍郎，总督仓场。河南用兵，出理军饷。主客兵十余万，追奔转战，迁止无常。珂随方转输，军兴无乏，录功增俸一级。改刑部，进左侍郎，已改佐兵部。宁王宸濠谋复护卫，珂执议独坚。九年擢南京右都御史，寻就拜工部尚书。以年至乞休归，卒。赠太子少保，谥简肃。”

嘉靖二年《恤典制》中也有记：“故致仕南京工部尚书进阶荣禄大夫黄珂，性资通敏，器识宏深，名早掇乎贤科，政首成乎大邑。内台执法，外臬提刑，超擢中丞，累迁卿佐。留台地重，方升总宪之阶：邦土任隆，旋正司空之位。考其清慎之操，特达之才，法比精明，风裁严整，威行海道，功著边陲。迨夫出入两京，回翔四野，益殫劳勩，多所建明。抗权竖之谋，犯凶威而不避；杜强藩之请，持正义而独坚。……纶言涣布，秩已亚于三孤；祝号重题，名式昭于百世。”

不只黄珂，明代遂宁黄氏家族一直有着“诗人世家”、“官宦门第”的美誉，从黄珂的祖父黄鉴，至其孙黄若榛，共历五代、一百余年，黄氏家族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尚书、布政使、知府、进士、举人、贡生多达十余人，可谓满门生辉，占尽风光。如此显赫一时的门庭和人物，其墓葬想必也是辉煌煊赫。机缘巧合，数月前我受邀去聚贤采风，便想顺路去黄坟山看看。

天不作美。那天出门的时候天色还算晴和，中途却忽然下起雨来。一群人毫无准备，被淋了个措手不及。在去往聚贤镇金井沟村一个柠檬产业园的路上，同车负责带路的镇文化中心小钟主任忽然抬手往左边一指，说：“喏，那就是黄坟山。”

我抬眼一看——这怎么会是“黄坟山”？不止没有想象中的“黄坟”，连“山”也不是想象中的山！眼前除了一片荒草，连一条勉强可以下脚的小路都没有！那

山与其说是山，倒不如说是一个土坡，还是一个低矮的小土坡！传说中达官贵人的墓葬，难道不应该是在青峰巍巍、松柏郁郁的“山”上么？眼前这片荒草土堆算个啥？

但钟主任确定地说，这里就是黄坟山，早年黄珂的墓葬就在眼前这荒草堆里，就在我们面前几百米的地方。“里面还有什么遗迹么？”我问。“早就没有了！土改的时候把坟挖了，改成了耕地；现在农村劳动力少了，耕地撂了荒，就只剩一堆荒草了。”钟主任有些叹惋。我不甘心，还想去看看。可不巧，那天穿了一身长裙，偏偏还蹬了一双7厘米的高跟鞋，望望那一人多高的荒草和草堆下泥泞的红土，我终究没有勇气迈进去。好在同行的两位男士自告奋勇，说不如他们过去拍些照片出来给我看看。我没有更好的办法，便只得道了谢，由一位向导带他们去，自己留在车边等着。

过不多时，他们从荒草丛里钻出来，衣服头发都被雨水和露水浸得透湿。一位朋友提起他被红泥巴糊得看不出本来面目的鞋子，对我笑笑：“你看看！幸亏你没进去！”我暗道一声惭愧，连忙接过他递来的相机，翻看他们拍的照片。荒草！荒草！全是荒草！一人多高密密层层层的芭茅，七倒八歪钩钩绊绊的刺藤，还有地上不知累积了多少年的倒伏的枯草和杂乱的枯叶……我来来回回翻看了好几遍：“怎么全是荒草啊？”“拜托！我是摄影师，不是魔术师！本来就只有一堆荒草，我们还能凭空拍出一朵花儿来？”他们擦着鞋子上的泥，忍不住笑。

雨下大了。我虽然心有不甘，却也不能把一大群人全拖在这儿淋雨，何况还有采访任务在身。在心底长叹一声，我们只得上了车。

回来后，我一直心心念念，终是想要再去一次黄坟山，无论如何也要亲自走近看看——我不信那样显赫的一段历史会完全无迹可寻，哪怕只是一堆荒草，里面也应该埋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只不过需要有心人去发现，去解读。

重访黄坟山，成了我心底一个解不开的结。

其实我向来对墓葬是兴味寥寥的，尤其是所谓“达官显贵”的墓葬。

几年前，我曾经在西安勾留了数日。从大雁塔、小雁塔、钟鼓楼、回民街，到华清池、大唐芙蓉园，网上攻略中推荐的地方都走马观花地逛了个遍。作为十三朝古都，西安最不缺的就是各种遗址遗迹，可是我说出来估计很多人要骂我了，

至少是嗤之以鼻——我竟没去兵马俑，我居然没去兵马俑！最后一天，我实在想不起还有什么地方值得一去，甚至跑到西安音乐学院去坐了半天，可我就是没去兵马俑！不是没想到，在中国，恐怕是个人提起西安就会想到兵马俑吧，可我就是不想去，没兴趣——说到底，那不过是一个皇帝的墓葬而已。

在五千年中国历史长河中，黄珂之于秦始皇，怕是如同萤火之于太阳。堂堂秦始皇陵我且过门不入，却为何偏偏对一座小小的黄坟心心念念，记挂难安？我为的不是黄珂，而是他的女儿黄娥——明代四大才子之首杨慎之妻，蜀中四大才女之一。

《鉴戒录》说：“吴越饶营妓，燕赵多美姝，宋产歌姬，蜀出才妇。”蜀女多才自古有云，卓文君、薛涛、花蕊夫人、黄崇嘏……无不名动天下。明代女诗人黄娥，更以其卓绝的散曲创作成就独树一帜，被誉为“曲中易安”。

黄娥能文工诗，尤擅词曲。对其词曲，人们历来评价很高：万历版《杨夫人乐府词余》序中说“夫人篇什，云蒸霞烂”，称她“才情甚富，不让易安、淑真”；明代大戏曲家徐文长称赞她“才艺冠女班”，说她的曲词“旨趣娴雅，风致翩翩，填词用韵，天然合律”，“予为之左逊焉”（连自己也要甘败下风）；王世贞《艺苑■言》论黄娥的《寄外》一诗和《黄莺儿》一词，“升庵别和三词，俱不能胜”……

过去十余年间，我所在的这个小区县对外的宣传定位一直是“黄娥故里，田园安居”。安居是黄娥的故乡。黄娥是黄珂的女儿，也是安居的女儿，是安居 1258 平方公里土地上最为醒目的文化地标。

至今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当年第一次读到黄娥作品的情景。那天，我无意中在办公室翻到一本杂志，封底是一首曲谱。曲谱的名字已经不太记得了，但歌词却让我惊艳：“金钗笑刺红窗纸，引入梅花一线香。蝼蚁也怜春色早，倒拖花瓣上东墙。”一看词作者的名字，是黄娥，就是传说中的“黄娥”！再看下面的小注，方知这歌词就是《闺中即事》，黄娥少女时期的代表作。后人对她这首诗颇有推崇，说诗中有少女的天真烂漫，观察细致，技巧高明。可不知为何，我每次读到这几句诗，总不免想起《牡丹亭》里的杜丽娘，“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名门闺秀又如何？才华横溢又如何？在那样的时代，终究只能困于深闺，良辰美景空自流逝，美好青春生生禁锢。

窗外春色再好也不能涉足一望，只能悄悄从窗纸缝里透进一丝春的气息，连一只可以自由翻过东墙的小小的蝼蚁也不如！这样的黄峨，让我心动，也让我心痛。之后我便有意搜寻她的诗作来读，越读越对她的品貌超绝、才高于世无限倾慕，越读越为她的运途多舛、孤苦一生叹惋唏嘘。

黄峨自幼天资聪慧，饱读诗书，少时就以诗曲名满京城。明正德十四年（1519），黄峨与当朝首辅杨廷和之子、新都状元杨慎结为伉俪，“尚书女儿知府妹、宰相媳妇状元妻”的丰姿佳话传诵一时。夫妻二人既是同心诗友，又是恩爱夫妻，朝夕切磋诗文，填词作曲，清风明月，花前月下，过了一段幸福浪漫的生活。只可惜好景不长，婚后第六年，因为“大议礼”事件，杨廷和被迫辞官返乡，杨慎也于“中元日下狱，十七日廷杖之，二十七日复杖之，毙而复苏，谪戍云南永昌卫。”曾经的煊赫门庭就此败落。此时距离嘉靖元年（1522年）黄珂去世仅仅两年。杨慎谪戍永昌后，夫妻二人三十多年天涯永隔，其间只有嘉靖五年到七年，黄峨随杨慎在蛮荒之地有短暂的相聚，度过了三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嘉靖38年（1559年），年过古稀的杨慎含恨死于一座破败古庙之中。黄峨闻讯，千里奔丧，接回灵柩。杨慎死后，黄峨独力操持家族事务，抚养子侄，“诗不多作，亦不存稿，虽子侄不得见也”（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直到嘉靖四十五年（1565），明世宗晏驾，裕王朱载堉即位，次年改年号为隆庆。“大议礼”获罪诸臣终获宽赦，杨慎在死后七年被恢复原官，并追赠为光禄寺少卿，后来又谥封为文宪公；黄峨也由安人晋封为宜人。明隆庆三年（1569），黄峨病故，享年七十二岁。

去年夏天，我曾两度去到新都桂湖，在黄峨与杨慎当年生活过的地方驻足流连。隔着500年的岁月长河，我仿佛还能看到那一对燕尔新婚的璧人在湖畔吟诗论文，琴瑟相和。榴花红了，黄峨写道：“移来西域种多奇，槛外绯花掩映时。不为秋深能结实，肯于夏半烂生姿。翻嫌桃李开何早，独秉灵根放故迟。朵朵如霞明照眼，晚凉相对更相宜。”桂花香了，杨慎吟哦：“银汉无声下玉霜，素娥青女斗新妆。折来金粟枝枝艳，插上乌云朵朵香。”真真是神仙眷侣，引人神往！

新都何其有幸，有才子杨慎，还留下一座可供凭吊的桂湖。而安居又何其遗憾，虽为黄峨故里，可她幼时便随父在京城生活，出嫁后又多住在新都杨家，故土竟难以找到一处留有才女芳息的遗迹。如今我既然知道有这座黄坟山，自然别无可以说，非去不可！

筹谋了几个月，我终于在6月21号那天成行。

去之前，我一直跟聚贤镇党委书记谭歌联系。与别的乡镇领导不同，这位书记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尤其喜欢舞文弄墨、抚琴唱曲，也是雅士。谭歌依然安排钟主任给我做向导，还一再叮嘱，镇上要9点钟才上班，让我不要去太早。可我还是耐不住性子，8点半就到了镇上。

谭书记特意请了黄坟山所在的金井沟村的支部书记王勇陪同我们一起踏勘采访。那是一个50出头的壮实汉子，在金井沟土生土长，人事地理都熟悉，小时候还见过黄坟的部分原貌。

站在前一次停车的路边，王勇向我们描述了黄坟当年的样子。

就在从聚贤镇到金井沟的村道路旁，我们停车的位置，原来是一座牌坊。牌坊有两丈多高，是传统的三间四柱式。中间是正门，宽约丈许；两边各有一个侧门，能容一抬轿辇通过。牌坊是石质结构，四根石柱每根都要两人才能合抱。牌坊上雕刻有繁复的花纹，还有几个大字。过了牌坊就是一条石阶，一直通到黄珂的墓前。石阶全是用上好的青石板铺成，两米多宽，两边都有石质护栏，还立着石人、石马，都塑得栩栩如生。石阶的尽头是一个祭祀的平台，大约六七十平米，也是青石铺就。平台前面就是黄珂的墓。墓是圆顶方基，也是青石垒砌而成，墓高两米多。墓前三座石碑，中间一座最高，是主碑，两侧各有一块陪碑，上面刻着大段祭文。

黄坟在修建之后的几百年里一直保存完好，年节清明时还不时有人前来祭祀洒扫。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牌坊在文革初期“破四旧”运动中被拆。十多年后，坟墓也在七十年代改田改土活动中被拆毁、开掘。王勇记事的时候牌坊已经不见了，只从老一辈人的描述中了解到大概。而石阶和墓却是他真正见过的，只不过那时候才几岁大，只记得石碑上有文字，具体是什么却说不出——一则那时他根本不识字，二来就算他当时认得，现在也早已记不清。

据民国本《遂宁县志》中记载，黄珂死后，新都杨廷和、杨慎父子各撰有一篇《祭黄简肃文》。只是那些碑石铭刻，既无从查证，也无从推测，竟成了一个永久的谜团，让人不能不怅然唏嘘。

我坚持要王勇带我去黄坟遗址上看看。他有些迟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就是一片荒草，还有刺藤，不好走！”我坚持：“没事儿。我来就是专门要看黄坟的，没理由走到这里了再放弃！”王勇无奈，只好带我前行。

的确不好走！脚下完全没有路。芭茅草足有两人多高，叶子密密匝匝的，叶子边缘是一排细密的锯齿，稍不留神就人脸上、手上、腿上划出一道道细口子。一种叫不出名字的刺藤七弯八绕地肆意纠缠着，那刺上带着倒钩，在阳光下泛着凌厉的光。我一边用手拨开扑到脸上的芭茅叶——它们挡在眼睛前面，我差点什么都看不到了；一边闪转腾挪，尽量小心避开芭茅叶上的锯齿和刺藤上的倒钩；一边还要留心脚下，寻找可以立足之地。就这样艰难地前行了一百多米，眼前出现了一片空旷地，这里的芭茅和刺藤都被人砍倒了，在地上铺起厚厚的一层，脚踩上去沙沙作响。王勇说，这就是当年黄珂墓地所在的地方了。我正奇怪，难道现在还有人专门为黄珂的墓地除草？却不经意看到旁边有几块崭新的码放整齐的墓石，这才恍然，想来是有人看上这块风水宝地，准备在此修建阴宅，所以才来砍倒了这里的荒草。

王勇指给我看，哪里是原来的墓地，哪里是祭台，我们刚才从荒草丛中无比艰难地走过的那一段路，曾经全是青石阶梯，他小时候还常常和伙伴儿们在石阶两侧的石人石马上爬上爬下，嬉戏玩闹。

我站在空地上游目四望。不远处是一条小河，河对岸可以看到聚贤小学的教学楼，掩映在苍翠的树荫里。河这边是一片农田，玉米、水稻正昂扬拔节。再近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来时的村公路，然后就是我们刚才穿过的那一片荒草地。墓地两侧有两棵泡桐树，高大挺拔，枝叶繁密。微风起时，片片叶子如无数翻动的手掌，哗哗有声。有几只不知名的鸟儿藏在枝叶间，不时啾啾喳喳地唱几声。除此之外，四周是一片寂静。

泡桐是乡下常见的树种，每年清明时节，串串紫色的花开得热烈奔放，所以常被诗人视作清明之花。白居易《寒食江畔》诗云：“闻莺树下沈吟立，信马江头取次行。忽见紫桐花怅望，下邳明日是清明。”我问王勇，他说当年黄坟还在的时候，墓地四周都是松柏，并没有这两棵泡桐。那么可以确定，这树并不是为了祭祀黄珂所植。可是它们长得那么挺拔，而且一般高大，又不像是自然野生的。那么这两棵泡桐树是从何而来？是否另有深意？我不得而知。

黄珂是西眉镇黄安桥皇榜石人，鸣钟山并不是他的祖籍所在地。两处相隔数

十里，当年黄珂怎么会埋骨于此？我向王勇提出这个疑问。王勇说，当地民间传说，黄珂还是工部尚书的时候，请了 30 多个风水先生为他寻找宝脉，修建阴宅。先生们拿着罗盘，从京城一路搜寻，一直追到眼前这座山，无不惊叹称奇，感叹这是风水宝地。于是黄珂下令即刻动工，这里也就成了黄珂百年之后的埋骨之所。

为了证明传说所言不差，王勇特意把这里的“风水”奇特之处指给我看。在黄坟的前面，不远处有一条玉带河蜿蜒而过，正好把黄坟绕了半圈，恰似给它配上一条玲珑的腰带。稍近一些，是一块狭长形的水田，也跟着玉带河的弧度，把黄坟又护上半圈——叫做玉带田。再近一点，是一块弯月形的水田，跟着玉带田的弧度，把黄坟再包上一层——叫做月亮田。在月亮田的左右两侧，各有一块近似圆形的田，似一双龙眼嵌在两侧，就叫龙眼田。前有层层玉带守护环绕，中有一双龙眼熠熠生辉，背后还有黄坟山做坚实倚傍，无怪乎 30 多位风水先生都要惊叹此处是风水宝地了！

那 30 多位风水先生定然没有算到，在黄珂死后刚刚两年，新都杨氏就迅速败落，他最心爱的女儿黄娥也在之后的数十年里受尽飘零孤苦；更不会算到 400 多年之后，坐拥“风水宝地”的黄坟会被毁于一旦！

据王勇说，黄坟彻底被毁是在 70 年代初一个夏末秋初的上午。那天，村里的男女老少听说要“挖黄坟”，都跑来看热闹，直把一座小小的黄坟里里外外围了好几圈。起初，几个壮劳力凭着一股劲，拆毁祭台，刨开四周的泥土，都不觉有什么不妥。可是到了要真正撬开墓石，掘坟开棺的时候，大家都有些忌讳了，谁都不敢率先动手。最后还是一个叫何官德的年轻人胆子大，一钎子下去把墓石撬开。有了这第一个，后面的人就无所顾忌了，三下五除二就把一座古墓夷为平地。让围观的人大失所望的是，墓里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只有几块朽坏的杉木板、几片衣料、一小撮头发，仅此而已，连尸骨都没有发现一块。以至于当地老百姓后来都传说，这里只是黄珂的一个衣冠冢，并不是黄珂真正的埋骨之地。

王勇还说起一件怪事：当年掘黄坟撬出第一钎的何官德，在掘墓的第二天就无缘无故精神失常，疯疯癫癫十多年，一直到他离世。当地人都说那是掘了黄坟的报应。我虽然向来不相信有什么怪力作祟，却也一时间找不出什么合适的理由

来自圆其说。

沉思良久，我忽然想起一个疑问，当年村民们掘开黄坟，墓地变成了耕地，可墓石却是可以留作他用的，那些石牌坊、石阶、石祭台、石栏杆、石碑，后来到哪里去了？

一问之下，果然！当年的牌坊拆除之后，石料被运到玉带河边，修了一座桥，起名叫双龙桥。后来双龙桥因为选址不当，加上河面涨水，又被拆除。桥面石被运到下游聚贤小学旁，和别处的石料混在一起，重修了一座文昌堰桥。过去二十多年，村里的人们上街、孩子上学，都要经过那座桥。桥墩石则一直留在玉带河里，几十年过去，早已被河底淤泥掩埋。至于石阶和那些墓石，其中好的石料被用来修建当年大队部的保管室，那些被撬坏的、品相稍差的，则七零八落随意散放在附近的地方，早些年人们还不时可以见到。

我按捺不住，当即就要王勇带我去找那些墓石——哪怕找到半块也好！

皇天不负有心人。在黄坟山下的院子里，我们问到了村民邓财荣。他说在他家的菜地边上就有一块石板，他们用来拦水，看样子很像是当年的墓石。我和王勇喜出望外，连忙随他前去。

在他家院前的菜地边，我们看到了那块石板。石板呈长方形，长约1米，宽约三四十厘米，厚约七八厘米，上面已经全部覆上了一层泥土。单看这形状，不太确定是不是当年的墓石。邓财荣说，原来石板上是刻了东西的。我连忙请他打来清水，想把石板上面的泥土洗掉，看看上面刻的是文字还是图案，或许能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三个人一阵冲刷抹洗，终于让石板露出了本来面目。那是一块上好的青石，石板正反两面都有雕刻的痕迹，只可惜已经辨认不清纹样了。正面似乎是文字，能大概看出一些笔画勾折转角的痕迹；背面刻了两道长方形的框纹，其余的也辨不清了。不过，从石板的形状、大小和两面都有雕刻纹样来推测，这应该是石阶两侧的栏杆石。

我还想继续寻找，于是王勇和邓财荣又带我去查看了文昌堰桥和当年的双龙桥旧址。双龙桥自是什么也见不到了，那些桥墩石早已经被河水和层层淤泥淹没。文昌堰桥也没有半点线索，那些墓石混在其他的石料里，分不清谁是谁，而且天长日久被河水浸泡冲刷，石头上就算有什么痕迹也早就消磨殆尽。

在邓财荣那里，我又听到一桩奇事。当年掘坟的时候，他三叔父邓通才也在

墓旁围观，还在混乱里捡到一枚墓中的耳环，后来交给了公社的干部。我不太相信，黄珂的墓里怎么会陪葬耳环？可是邓财荣一再坚称所说属实。只是他三叔父已经去世多年，这事情便无从对证。

一番辛苦，却几乎等于一无所获，我忍不住有些失望。邓财荣告诉我们，不如去问问邓志明，他是村里年岁最大的几位老者之一，或许对当年的情景比较了解。

几经辗转，我们终于找到邓志明。老人已经将近 90 岁，所幸精神矍铄，头脑尚还清明。我向他说明来意，可是老人所说和先前王勇的话略无二致，并没有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唯一不同的是，老人提到当年拆毁牌坊的情景。那时他已经十多岁，见到村民们把牌坊拆掉，那些石头太大，十几个人都抬不动。于是人们从山上砍倒几十棵树，锯成一截一截的圆木，把石头撬到圆木上慢慢往前滚，这才把石头运到玉带河边。从开始拆牌坊到石头运完，足足用了十多天。单单拆一座牌坊就用了十多天，当年修建黄坟又耗费了多少人力、财力和时日呢？我不能想像。

在聚贤，我还听到一个传说。早年从遂宁县城到聚贤镇必须翻过一个又长又陡的垭口。最初那个垭口的名字叫“手势垭”，因为山上山下距离遥远，人们喊话必须用手比划着才能听懂。有一年黄峨回乡祭祖，正要翻过“手势垭”，却遇到一个本地乡绅从对面过来。过垭口的那条小路狭窄陡峭，两台轿辇根本错不开。乡绅听说对面轿中坐的是黄峨，连忙招呼轿夫停下，小心翼翼退到路边，让黄峨先过。黄峨心有所感，取下随身的首饰，让随从交给那位乡绅，请他帮忙把小路重新修整，方便人们通行。后来，人们为了怀念黄峨捐资之情，就把“手势垭”叫做“首饰垭”。

这个传说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如果是真，从黄峨还乡祭祖还有随身轿辇和仆从可以推测，应该在杨氏一族因“大议礼”事件获罪之前；黄珂于 1522 年辞世，距“大议礼”事件只有两年，然而我在史志上并没有查到黄峨夫妇在此期间还乡的记载。如果是假，“首饰垭”这个地名和这个传说却是当地老百姓口中代代相传，不像空穴来风。这又是一个不解之谜了。

一番寻访，我终于解开一个心结，却留下更多疑问。当年牌坊上刻的文字是

什么？黄坟上的两棵泡桐树是何人所植？掘墓开棺的何官德为什么会发疯？黄坟究竟是不是黄珂真正的埋骨之所？邓通才当年从黄坟捡到的耳环从何而来？

“首饰埕”是不是因黄峨而得名？这些问题我无从解答，只能留待文史专家们调查、研究了。

我再想不出还有什么线索可以搜寻，只好回去。镇政府食堂已经备好午餐，桌上有一大盘凉面。厨房师傅说：“冬至饺子夏至面，今天正该吃凉面。”原来这天正好是夏至日。我打开手机日历一看：“6月21日，农历5月27，夏至，宜祭祀、作灶，余事勿取。”

我心下慨然，竟然这样巧合！我上午寻访黄坟，虽未敬奉香烛，也权当是一个后人对黄峨、对黄峨父亲的祭拜了。我是心意所至，不知他父女是否泉下有知？